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HILMAR AND ODETTE

两个“半犹太人”的命运

[加拿大]埃里克·科克著
蒲黎 杜正国 译

科克先生讲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故事组织巧妙，感人至深，它再一次证实了有时历史的真相可能比虚构小说离人们更远，特别是在20世纪四十年代的欧洲。讲述这样的故事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广博的背景知识，强烈的心理理解力，以及一个天才作家所具备的才华，科克先生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瓦尔特·莱克　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埃里克·科克这本引人入胜、风格独特的小说包含了强烈的情感，准确的历史观察以及典型的戏剧性。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杰作。

——艾德里安·克拉克森

HILMAR AND ODETTE

无论从哪方面看，本书都堪称一部佳作。它不仅仅是一部回忆录或者家史，它是一种对历史真相的探求，要求作者具有研究、调查、发现与想象的能力。但这本书首先是一部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向人们展示了在纳粹执政前和执政期间德国人的生活，读者很难读到比本书更有价值，更具吸引力的回忆录。

—— 约翰·罗伯特·科伦布

ISBN 7-5366-3962-7

9 787536 639621 >

ISBN7-5366-3962-7/I·758

定价:15.00元

658960

47.62
KK

HILMAR AND ODETTE

两个“半犹太人”的命运

[加拿大]埃里克·科克著
蒲黎 杜正国 译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藏书

中南大学 图书馆
C0451729

中国 重庆出版社

Hilmar and Odette
by Eric Koch

本书据 McClelland & Stewart Inc. 1996 年版译出
Copyright ©Eric Koch, 1995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McClelland &
Stewart Inc., Toronto, Canada.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199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中文版专有出版权© 1998 重庆出版社
中文版国际版权通过 Livingston Cooke Agency Ont. CANADA 获得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聂丹英**

[加拿大]埃里克·科克著 蒲黎 杜正国译
两个"半犹太人"的命运
LIANGGE "BAN YOUTAIREN" DE MINGYUN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25 插页 10 字数 120 千
1998 年 8 月第一版 1998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7—5366—3962—7/I·758
定价:15.00 元

658960

奥托·科克

埃达·科克/内特

埃米尔·内特

VAL 11/03

奥托·科克(中)1914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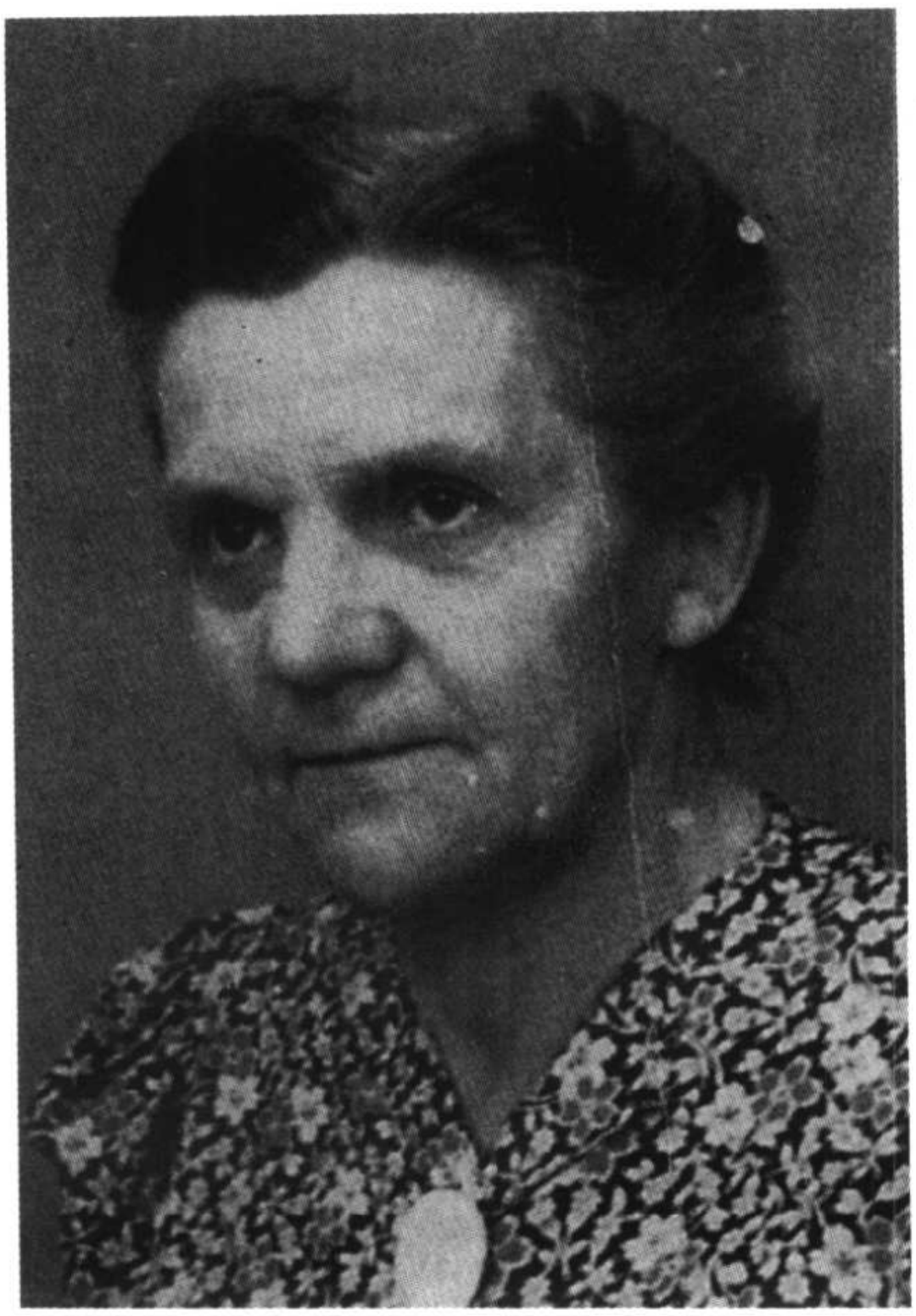
路易斯·科克

莫里兹·冯·莫克勒男爵

埃米丽·冯·莫克勒男爵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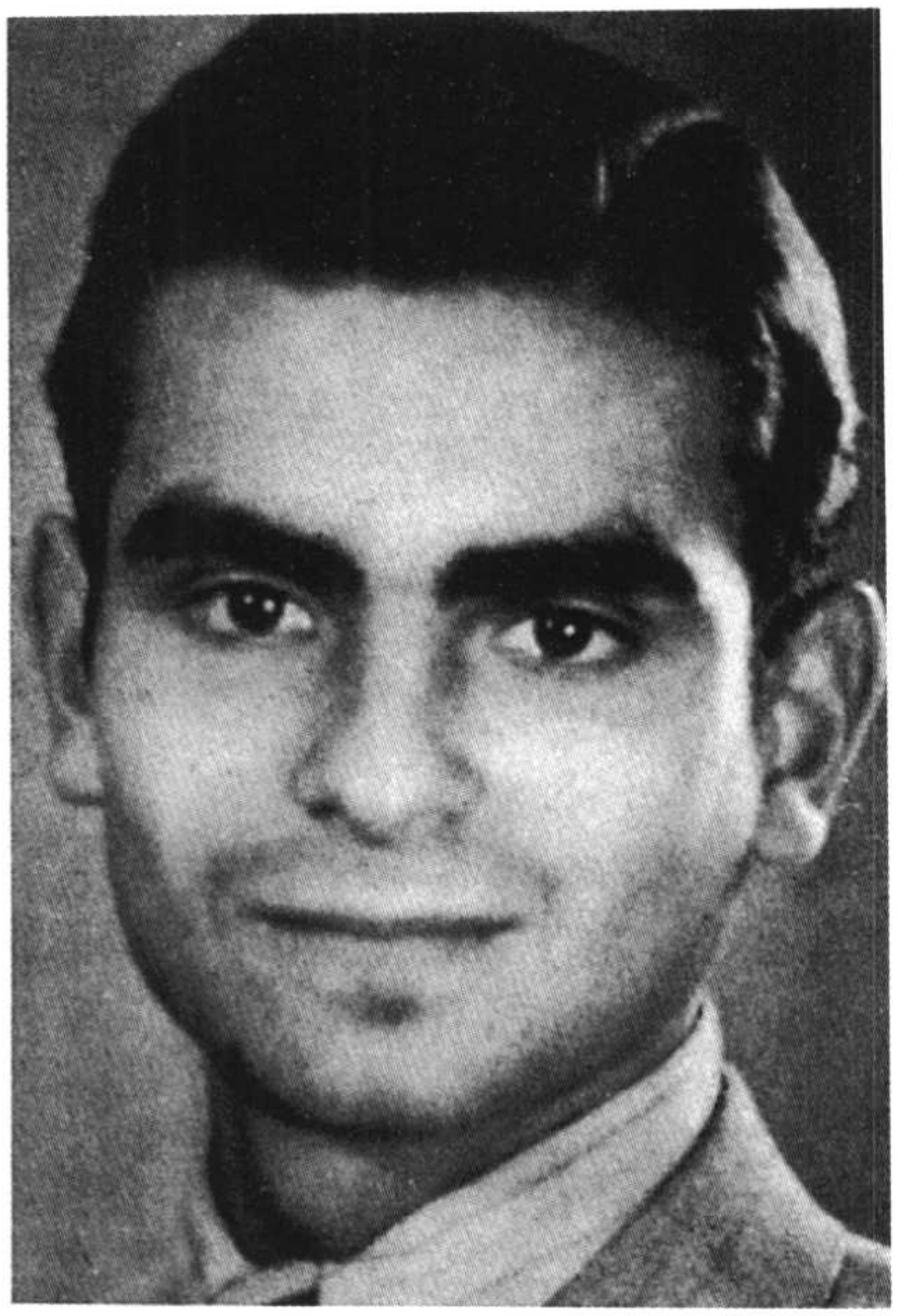
埃米丽·冯·莫克勒男爵夫人

弗诺·韦尔克和希尔玛、霍斯特在一起



弗诺·韦尔克

布伦希尔德



希尔玛

柏林，1941 年奥德特（最左）汉斯·埃伦斯（最右）

奥德特与汉斯·埃伦斯

汉斯·亨克尔

赫斯·瓦德弗林顿

格德鲁恩

布伦希尔德(1989 年 7 月)

前　言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300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的开始。在此之后的短短一百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似的”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许多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他们以宏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一百多年前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可惜没能赶上当天邮车传遍北美大陆的美好祈盼：“愿生息在这块大陆之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芸芸众生，在一个英明、公正的政府领导下，收获明智的事业、诚实的劳作和虔诚的信念所结下的果实。”（德斯蒙德·莫顿《加拿大简史》1994年）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果实成熟了，就如像加拿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了成熟的形态一样。这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短暂然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相互交融却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怀着对这一多元文化

强烈的猎奇心，我们把自己欣羡的目光集中在近年来加拿大各种获奖文学作品上，推出了《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包括诗歌、纪实文学、长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集，奢望通过我们的译介，能再现大洋彼岸这个年轻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梦幻与追求。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趋势，不断采撷加国文坛上绽开的朵朵鲜花，奉献给我国读者。

本丛书第一批共三本：长篇小说《英国人的仆童》、短篇小说集《爱之猎物》和纪实文学《两个“半犹太人”的命运》。

主编　赵　伐　李书敏

开 卷 语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此“好运”，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家庭中的两个成员是私生子，而他以前对他们的存在简直一无所知。

我就有这种“运气”。

我发现的这两个人，其中之一是我的异父姐姐。

另一个也是我的近亲。

但发现家丑也有令人欣慰的一面，特别是在本书中两个主人公的故事已经远远超越了个人的意义。

因为他们的故事阐释了一段纳粹史，与那些记叙历史名人的著作相比，本书毫不逊色。

具体地说，这本书阐释了纳粹为推行其种族政策而进行的史无前例的诡辩，这种诡辩集中体现在他们对“半犹太人”这一类人的定义。本书的两个主人公都属于这一类人。一种荒谬的政策，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其后果尤其令人恐惧。没有人为当今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种族清洗”诡辩，在这一点上，纳粹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要在德国处决我，根本不需要理由，因为依据“纽伦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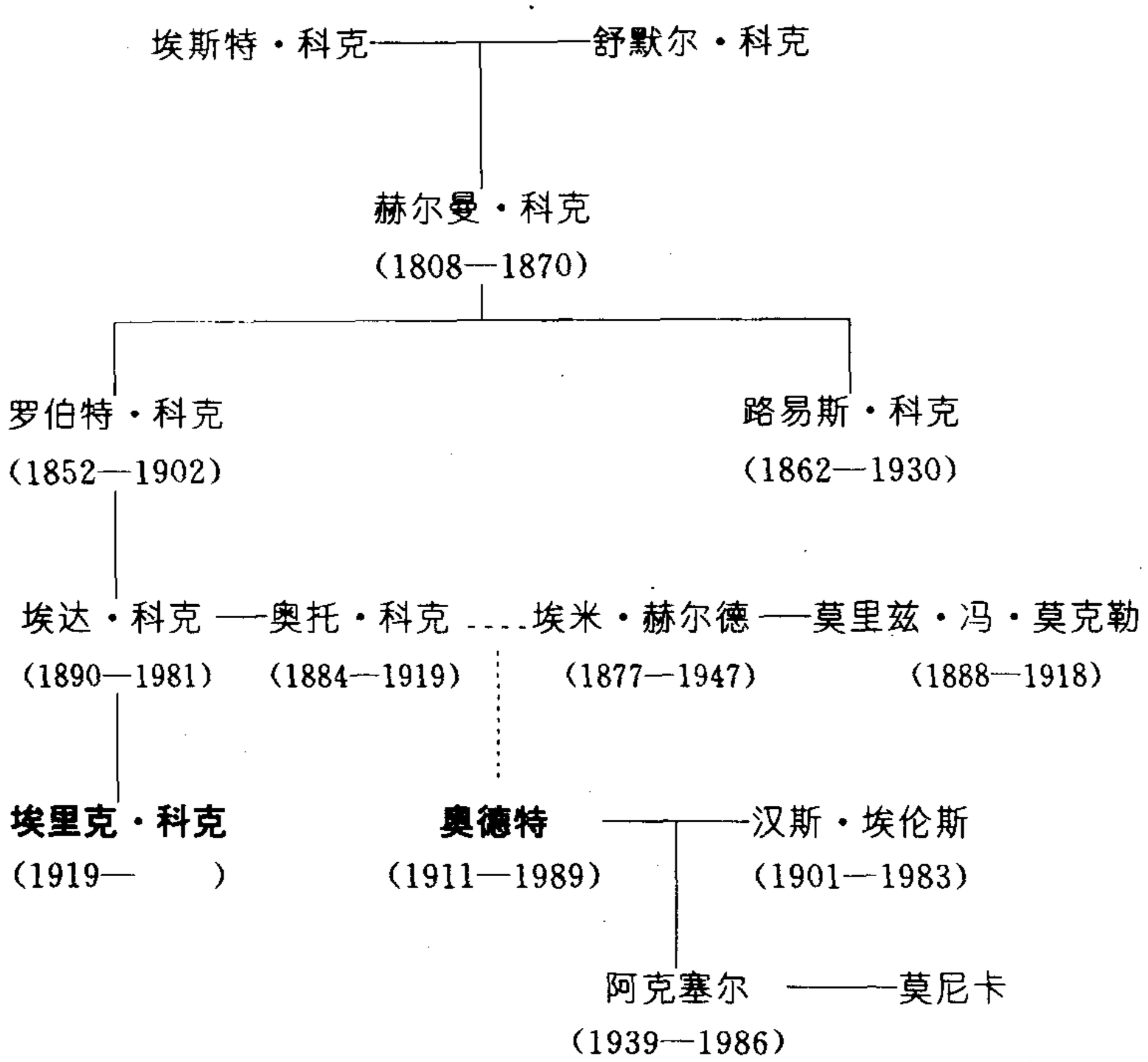
法’，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非雅利安人”。我15岁的时候离开德国去英国读书，当时是1935年，希特勒上台执政已两年了。如果当时留在德国，我肯定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样。

1933年在我们被正式宣布为劣等的、危险的人种之前，我的家人都是带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当时他们都未感到两种血统之间有任何冲突。到纳粹执政前夕，犹太人已经高度融入了德国社会。这种融合是史无前例的，在历史上只有被称为“西班牙犹太人的黄金时代”(11－15世纪)能与之相比，当时犹太人与基督徒和穆斯林和睦相处。虽然反犹太主义一直存在，但在19世纪末以前，犹太人以及德国的犹太移民很少被看作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种。在我的家乡法兰克福市，早在12世纪就有组织严密的犹太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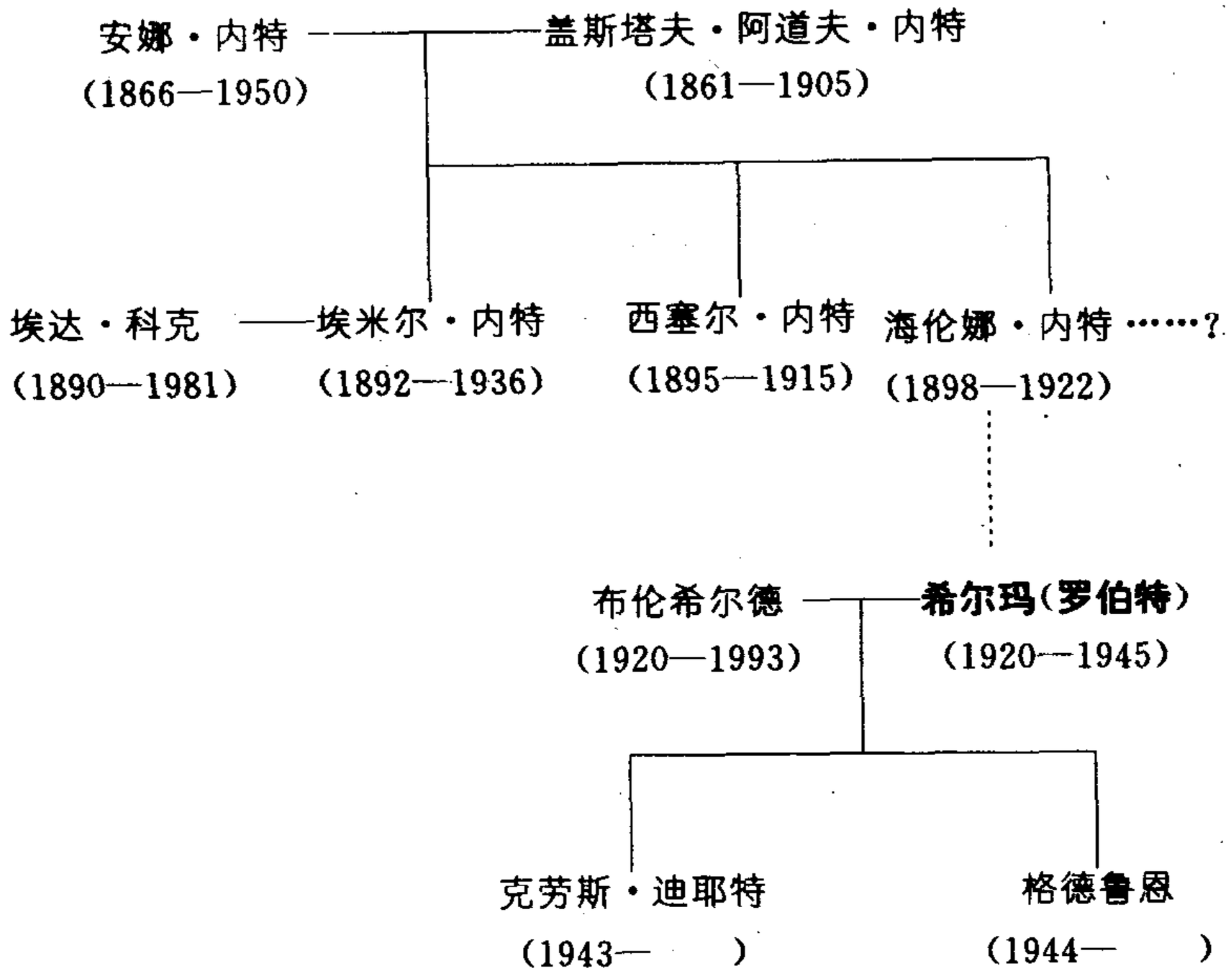
本书开始是对我父亲奥托·科克的描写，然后是对我继父埃米尔·内特的描写。奥德特与我都是奥托·科克的孩子，希尔玛是埃米尔·内特的妹妹的孩子，奥德特的故事与希尔玛的故事交错展开。也许刚开始人物之间的关系显得比较复杂，所以我特意加了两份简单的家谱图。

本书绝无任何虚构之处。

科克家谱


埃斯特·科克
舒默尔·科克
赫尔曼·科克
(1808—1870)
罗伯特·科克
(1852—1902)
路易斯·科克
(1862—1930)
埃达·科克
(1890—1981)
奥托·科克
(1884—1919)
埃米·赫尔德
(1877—1947)
莫里兹·冯·莫克勒
(1888—1918)
埃里克·科克
(1919—　　)
奥德特
(1911—1989)
汉斯·埃伦斯
(1901—1983)
阿克塞尔
(1939—1986)
莫尼卡

内特家谱


安娜·内特
(1866—1950)
盖斯塔夫·阿道夫·内特
(1861—1905)
埃达·科克
(1890—1981)
埃米尔·内特
(1892—1936)
西塞尔·内特
(1895—1915)
海伦娜·内特……?
(1898—1922)
布伦希尔德
(1920—1993)
希尔玛(罗伯特)
(1920—1945)
克劳斯·迪耶特
(1943—　　)
格德鲁恩
(1944—　　)

虽然犹太人试图融入日耳曼——基督教主流社会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人们都梦想将来有一天日耳曼与犹太人能够相互融合，有一段时间，这种梦想似乎就要变成现实。然而谁也没能料到，1933年之后，这个美梦彻底变成了一个恶梦。

朱利叶斯·舍佩斯：《德国犹太人的爱国主义》

我父亲的肖像

当我仅有三个月大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我只是在几次喁喁低语中听到提起我父亲。他留下的东西——在一战前参加国际马术比赛所获得的银质奖章、他收集的老式钟表和他的小提琴——都被当成文物看待。直到母亲临死之前，她几乎没有谈起过我父亲。

在东线与西线战场上战斗四年之后，父亲奥托·科克于1919年11月去世。

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饱受那脱臼的肩膀的折磨。那是他在一次骑马中出事造成的。他本打算只要战争一结束就到医院去治疗。他曾说，只需一个小手术就能解决。最终他去了医院，但在手术中出了事故：血液污染。他死的时候我母亲29岁，有3个孩子。

作为我爷爷在法兰克福珠宝店的合伙人，父亲过得并不舒心。他对马的兴趣远远超过珠宝生意，而且他的性格有点儿忧郁。

鲁道夫·宾德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1915年在法国作战时他是父亲的司令官，对马的共同爱好使他们在战前就成为好朋友，他曾经讲过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宾德接到命令要给一个步兵旅的将军选个勤务兵。他把科克中士送了去。这个受过良好教育、举止大方、性格开朗、模样英俊的年轻人，很快获得了将军的好感。因为自从他来以后，将军的马突然焕发了青春，一切都变得井井有序起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对地图的识别能力，将军常带他一起去部队视察。

将军对科克中士非常满意，用他的话说，科克中士圆满地完成

了许多任务。几周之后，科克中士被授予一枚铁十字勋章。后来将军给宾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种优秀的年轻人没当上军官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他具备一切所需要的品质。宾德于是准备好材料向皇帝请求授予科克官职。

这件事很快有了结果。当将军看到科克的申请表上“宗教信仰”一栏写着“犹太教”时，他顿时感到热血上涌。

将军骑着快马去找宾德。

“你知道科克是个犹太人吗？”将军问。

“当然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给他申请官职？”将军这句话显然有点不合逻辑。

“坦率地讲，”宾德回答说，“我丝毫不认为他的信仰会减损他的勇气，他的正直和才能，也不会抹掉被你发现的、令你赞不绝口的那些优良品质。”

“我并不想否认这些，”将军说，“但你必须承认在他身上具备犹太人所有的特征……”

宾德谨慎地思考着该如何回敬这句话，其实将军显然并没有发现那些所谓的“犹太人特征”，而且，将军其实自己也不清楚他所谓的“犹太人特征”到底指什么。

将军没有回答。“总之，你必须撤回申请。”他只说了一句。

“但是赫尔将军，”宾德说，“是您让我写申请的。况且，这份申请是在我的责任感和良心的驱使下写的，我怎么能撤回？”

一连好几个星期，将军都没有再提这事，但他每天都在科克中士身上发现新的“犹太人特征”。

有一天，将军对宾德说，“你怎么评价科克，那是你的事。但我认为这个年轻人身上的确存在着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犹太人特征’。实际上，”将军又补充道，“他的身上只有犹太人的特征。”

宾德不想再跟将军争论这件事。

“赫尔将军，”他若有所思地说，“既然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他身上除了犹太人的特点，还会有其他什么特点呢？”

“你真是这样认为吗？”

“确实是的。”

将军骑马赶回营区，在申请上签了字。

每隔两年，我都要去法兰克福最北端的犹太人墓地去悼念。每次当我踏进大门，我都心怀崇敬。我去这个地方一半是因为去凭吊我的祖先，更主要是这里与法兰克福的许多地方相比，是仅存的从我童年时代起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地方，我与这儿的许多居民都很熟悉。

墓地大门由四根科林斯式柱组成，风格古典，门上刻着几行金字，是用希伯来语书写的《旧约》中的诗句，试图表现犹太人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这座墓地建立于 1828 年，因为 1270 年建于巴腾特拉斯市中心的老墓地早已拥挤不堪。

这座墓地共有 3 万至 4 万座墓，很多墓看起来比罗思奇德家的墓显得更简朴，其中有一块纪念碑为纪念 467 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祖国而牺牲的犹太人。

1919 年 11 月，鲁道夫·宾德在这块墓地上为我父亲奥托·科克的葬礼致词：

请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小故事。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离开了他的妻子来到我的阵营参加战斗。

他成了我最好的战友和最忠诚的军官。

他冲到队伍的最前列去抗击敌人。我等到天黑还不见他回来。我在恐惧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漫漫长夜。我想这个勇敢的骑手可能

难以生还。

天亮了，年轻人骑着马回来了。他的头盔掉了，笑望着我，还牵着另一匹马。

他与朋友同欢乐、共悲伤。

他是个正直的人，这是对他最好的评价。在他身上这种正直的品质是显而易见的，而最显而易见的，也是这种正直的品质……

14 年后，在 1933 年的上半年，鲁道夫·宾德像许多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样，面对世界各国对新纳粹政体的攻击，他也为这种新政体进行辩解。我想，但我不敢肯定，他对于“绅士”的理解，这个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的主题，使他在 1933 年以后仍然与爱国的犹太德国人保持友谊，尤其是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的人。

尽管他是普鲁士诗歌学会的会员，但他很快失宠了。他没有加入纳粹党。宾德的那些贵族化的理想主义与纳粹党的主张显得格格不入。他对诗歌学会的要求很高。后来，他失掉了评奖委员会评委的资格，因为他经常提名那些有犹太人背景的作家。例如在 1935 年提名《没有品格的男人》(作者罗伯特·穆塞尔)，但遭到拒绝。宾德表示强烈的抗议。1937 年，宾德年满 70 周岁，他的生日异常冷清。1938 年，宾德去世，没有一个纳粹党的代表出席他的葬礼。

1966 年，一本名为《鲁道夫·宾德“绅士”理论的伦理基础》的书出版了。在本书作者所描绘的 1914 年前的宾德身上，我发现很多特点，我想——我希望——我的父亲也同样具备。

宾德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寻找一种生活方式，后来他从那些纯种马的身上获得了启示。从那些马身上流露出来的贵族气质，它们矫健的奔跑和无所畏惧的勇气使宾德获得了最有价值的生活的真谛：“我骑在马上所学到的东西是任何人都未教过我的。我学会了

忍耐，学会了永不投降，永不放弃。我学会了集中精力而不放纵自己……我懂得了爱的本质。我学会的这一切既使我受益，又让我受到了惩罚。”

我继父的肖像

埃米尔·内特来到法兰克福一两年后认识了我母亲，那时他快三十岁了。他在瑞士达沃斯的一家结核病疗养院里度过十年。1930年，当我和我姐姐、哥哥阅读了托马斯·曼所写的《神奇的山脉》后，大家都认为这本书不仅是汉斯·卡斯托普的一本编年史，更是我继父的。我继父这一生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生与死之间徘徊，就像汉斯·卡斯托普一样。到法兰克福后不久，医生宣布他健康状况良好，可以结婚。1930年，他跟我母亲结了婚。那年他38岁。

埃米尔·内特相貌堂堂、博学多才，但喜怒无常，难于接近。他常常只戴一只眼镜。沃尔夫·内特和雅各比是著名的制造商，他们的工厂遍布德国各地，包括柏林。埃米尔·内特就是合伙人。这些工厂主要生产波状铁皮、锅炉、桶、桥梁以及候车厅的预制件。我时常感到纳闷，我继父在疗养院度过的那十年中是怎样学到这些管理技能的。

他的曾祖父沃尔夫·内特是废旧金属商。1833年在布赫尔的一座小城创下了这家公司。1871年在德国吞并了阿尔萨斯——洛林后，内特家族在斯特拉斯堡建立了一个分公司。埃米尔的父亲——阿道夫·内特穿过莱茵河，成了这家公司的一名经理。

碰巧的是，布赫尔这个地方使我的继父和我母亲可以找到很多共同之处。埃米尔的父亲出生于此，我母亲的母亲也是。实际上，

我母亲的曾祖父也在同一座小镇上创办了一个纺织厂，当时雇佣了300名镇上的人。

在布赫尔，犹太人出奇的多。1853年，镇上居民有3011人，其中10%为犹太人。而19世纪的德国犹太人占全国总人口数从未超过13%。到1933年，由于一些大城市如法兰克福的吸引，使犹太人只剩下73人。在屠杀之后的今天，没有1个在布赫尔出生的犹太人居住在这里。

阿道夫·内特与安娜·西蒙结了婚，共有3个孩子都出生在斯特拉斯堡：埃米尔生于1892年，塞西尔生于1895年，海伦娜生于1898年。1905年，年仅46岁的阿道夫·内特去世了。他死后，哥哥卡尔以他自己和阿道夫的名义给布赫尔捐赠了一笔钱，用于修建一座市政公园。公园里那块用于纪念这次捐赠的金匾，侥幸逃过了纳粹的劫难，保存至今。

可能是受了女家庭教师的传染，阿道夫与安娜的3个孩子都染上了结核病。1915年，只有20岁的塞西尔在柏林死去。1922年，海伦娜死在达沃斯，24岁。

埃米尔22岁那年突然得了病，那时他正在去纽约的途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他母亲立即去照顾他并陪同他返回。战争爆发以后，埃米尔一直后悔没能去法国参战，他想加入他曾服过兵役的那个著名的军团去战斗。

在达沃斯的那些年，埃米尔·内特对犹太人问题发生了兴趣，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虽然他自己宣称并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成了一名犹太人组织的成员和希伯来大学法兰克福友好学会的会员。1934年至1935年期间，他从自己的藏书中拿出几百本关于近代德国工业史的书籍赠送给希伯来大学。

当埃米尔·内特的医生告诉他身体恢复较好可以结婚时，他

们肯定对内特的健康状况过于乐观。但谁也预料不到1933年将要在德国发生的事，预料不到这种形势需要一个何等强壮的人才能应付。我哥哥记得在1933年的夏天，也就是纳粹执政德国的第一个夏天，我继父对他说，如果希特勒发动战争，犹太人是无法在德国生存下去的。现在已无法知道埃米尔·内特所预料的“无法生存”到底指哪一种情况。但即使是最富有想像力的悲观主义者当时也没有料到后来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我父亲很快意识到家庭所面临的危险，除了移民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家没有移民出国主要是由于埃米尔·内特的健康原因，他无法制定一个周全的计划并劝说我母亲帮助他实施。我母亲对危险的认识总比我的继父慢半拍，而且她不能完全放弃与他前夫家族的联系。科克一家不相信纳粹党会在德国横行很久。埃米尔·内特曾考虑移民去巴勒斯坦。因此在1934年，我们家聘请了一名家庭女教师给我们讲授希伯来语。第二年，我们考虑把法国作为目的地。无论最后的归宿在哪儿，埃米尔·内特想尽办法把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弄出德国。1934年，他联系上了在英国的朋友让他们在当地给我找了一所学校。

在1925年，他寄给好友的一份信仰声明中，埃米尔·内特宣称自己是一个“虔诚的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同时，也不是一个泛神论者。他的信仰是神秘的。他完全接受生活中充满的矛盾和荒谬。他可以面对生活中的光辉与污秽，喜悦与批评，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亡。“我对死亡从来不感到恐惧，它只不过是阳光明媚的生活中的一片阴影”在他图书馆的玻璃柜里收藏了一些中世纪的雕塑，名曰《死亡之舞》。

1936年2月一个寒冷的星期日的早晨，他向他的司机借了一只左轮手枪——犹太人不允许拥有武器——来到办公室，开枪自杀了。

埃米尔·内特与犹太人教士乔基姆·普林兹(柏林一个年轻的犹太教士,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关系密切,后来成为美国最杰出的犹太教士之一)见过两次。在内特去世前两年写下的遗嘱里,他曾请求普林兹在他的葬礼上致词。

17年前,鲁道夫·宾德在犹太人的墓地纪念我父亲;17年后,教士普林兹在同一个地方为我继父的葬礼致悼词。我与埃米尔.内特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相互理解,虽然理解他不是件简单的事。

很难为他的一生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在这一刻当所有的事情都走到了尽头,当他的身体被包围在几块木头中,我们意识到哪怕想要知道一点儿关于他在里面生活的事都已不可能。

埃米尔·内特敢于选择死亡——十年之后在他对活着已感到深深地失望的时候。他冒着巨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他对生活的热爱,伸展开他每一根神经,每一寸肌肤,去迎接死亡。他热爱生活中的一切事情,无论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他如此紧紧地拥抱生活,是因为他深深地眷恋着它;害怕失去,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双臂如此虚弱……现在,一切与现实的冲突都不存在了,不会再折磨他了。

目　录

前　言……（1）

开卷语……（1）
科克家谱……（3）
内特家谱……（4）
我父亲的肖像……（6）
我继父的肖像……（10）

第 1 章　来自华盛顿的电话……（1）
第 2 章　奥德特……（8）
第 3 章　那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做的……（18）
第 4 章　那好吧，她叹息道，那么明天过来喝茶吧……（28）
第 5 章　基尔，1989 年 7 月初……（32）
第 6 章　慕尼黑，1989 年 7 月下旬……（39）
第 7 章　请告诉我你父亲的血统……（43）
第 8 章　赫林根，威斯巴登，法兰克福，柏林……（48）
第 9 章　恐惧……（54）

第10章 汉斯·埃伦斯 …… (58)
第11章 探寻与研究 …… (64)
第12章 沙龙 …… (67)
第13章 告诉我——这个女人是不是疯了？ …… (70)
第14章 莉莉·玛莲 …… (73)
第15章 现在只有元首能够帮助你 …… (79)
第16章 我们向元首宣誓 …… (84)
第17章 狱中的通信 …… (89)
第18章 阿克塞尔 …… (95)
第19章 最浅的深度 …… (98)
第20章 树林里的小屋 …… (103)
第21章 相聚布哈尔 …… (107)
尾 声 …… (109)

致谢词 …… (111)
译后记 …… (112)

第一章

来自华盛顿的电话

埃米尔意识到，对奥米来说，1987年在洛杉矶的情形与1937年在维尔茨堡时差不多。而这一切都源于她17岁的女儿怀孕给她带来的耻辱……

苏姗·希恩：《没有什么可指望》

1988年10月下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住在华盛顿的姐姐打电话给我。我们每个星期日要通话。我住在多伦多。这次该姐姐给我打电话。

“你看到《纽约人》上的一篇文章了吗？”她问。

我没看。

“去找来读一下吧。或许会让你想起很多事情。下周再打电话给我。”

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好莱坞著名音乐编辑的故事——她是犹太人，出生于德国南部维尔茨堡。1937年，她17岁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当时正是希特勒上台执政的第四年。她和她母亲的关系变得非常糟糕。后来她在瑞士生了一个女孩，但她母亲却对她说孩子

一生下来就死了。实际上，这个女孩身体非常健康，被人领养。十几年后，女孩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她一直到养父母去世后，才开始寻找生母，那时，她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1984 年，她终于找到了生母。当年那个说谎的祖母还活着，住在洛杉矶一家豪华的退休旅馆里。当她见到自己的孙女，看到谎言被戳穿时，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当时我们都是这样处理这种事情的。”

当我读完这个故事，我立刻想到我姐姐说的就是罗伯特——海伦娜的孩子。

1919 年 3 月，在埃米尔·内特的妹妹海伦娜还十分健康时，她陪她妈妈去了苏黎世，同行的还有安娜·贝尔。她们可能要去达沃斯找埃米尔，就在多登大饭店住了几天。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4 个月，饭店里住着形形色色的人，每天都要发生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一天早晨，安娜·内特发现她的女儿躺在床上，被人用药麻醉，不省人事，显然是遭人强奸了。这件事很多年后我继父才告诉我母亲：可能是头天晚上与她跳舞的那个希腊或者埃及外交官干的。

9 个月后，在极保密的情况下，这个男孩在日内瓦出生了，取名叫罗伯特。

《纽约人》刊登的那篇文章与内特所说的共同之处在于：母亲都是犹太人，都是在瑞士生下了私生子。

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1921 年，当罗伯特 1 岁多的时候，他被柏林东部一个小镇上名叫卢瑟安的牧师夫妇收养，离法兰克福很远。这一点也是两个故事的共同之处。

“那么，”一个星期以后，我姐姐问我，“你打算怎么办呢？”

“不怎么办，”我回答说，“我很忙。”

“想想吧。下个星期天我们再谈。”

我开始回忆往事。我感到不安是因为1951年，在罗伯特被人抱养后的30年，我们曾戏剧性地收到一封突如其来的信。那时我们对那封信无动于衷。虽然当时我们有许多理由。但现在，1988年的今天，我再也无法逃避良心的谴责。

1939年2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母亲离开德国去伦敦。她因此而逃过劫难。那段时间正是德国人空袭伦敦的时候。1943年10月她被人护送至在纽约的姐姐家。我姐姐的丈夫也是来自德国的难民，加入美国军队。我哥哥在1937年也移民新奥尔良。

1951年，当时我母亲是华盛顿一家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她收到了一封信，是日内瓦的一名律师写给她的。头年3月，85岁的安娜·内特死在那里。她的小儿子，我的继父埃尔米·内特，1936年2月自杀，安娜·内特两周后离开德国去瑞士，此后一直未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一战前，我在苏黎世见过她一面，但她和我母亲没有再见面，彼此之间关系冷漠。1951年我们家的人和内特家族的成员也没有什么密切联系。

日内瓦的律师在信中说，我母亲是安娜·内特的继承人之一，其实除了一个并不贵重的戒指以外，并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但律师在信中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我母亲继承人的地位受到了另一个自称叫内特的妇女的挑战。她住在汉堡东部的一个小镇，是海伦娜的儿子——希尔玛的遗孀。这时我们才知道，罗伯特被人收养之后名字改作希尔玛。

这个名叫布伦希尔德·内特的妇女，以她两个儿子的名义争取这份遗产。律师在信中说，根据德国的法律，这两个孩子有权获得祖母的遗产，尽管曾祖母在立遗嘱时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信上说，由于希尔玛的犹太人血统，他被禁止与布伦希尔德结婚，他们的婚姻那时被认为是非法的。直到二战以后才确认了这段

婚姻，他们的儿子也被认为是合法的婚生子。

信中还提到了其他令人震惊的事情：希尔玛后来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1月22日死在奥地利莫松森附近的古森。

我想希尔玛在集中营的生活就像我在新闻短片中见到的那些情景一样，饱受摧残，骨瘦如柴。

我母亲着手与其他继承人联系。几经考虑后，没有人对布伦希尔德提出的质疑作出反应，也没有人给她提供帮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更重要的事要考虑，我们自己家族里的人也有那次大屠杀的遇害者。1944年，我来到遥远的蒙特利尔加入了加拿大广播公司，每天两次通过短波对德国广播，而且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除此之外，我承认“布伦希尔德”这个名字让我感到有点不舒服。1937年至1940年5月，我在剑桥大学读书。那时候，希特勒袭击了荷兰，整个英国陷入了一片恐慌，担心德国的入侵。我和另外一些从德国或奥地利来的难民被当作“敌国侨民”——潜伏的纳粹间谍——受到拘押，后来送往加拿大。我在有刺的铁丝网里度过了1年半，其间3个月在英格兰，其余时间在加拿大。1941年底，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前一个星期，我被释放了。我在多伦多大学继续我的学业，于1943年春毕业，正是我母亲来纽约前夕。

我母亲给日内瓦的律师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非常遗憾，我们不能为布伦希尔德和她的两个孩子做些什么。

这就是在1988年，我们感到问心有愧的原因吧。

“你有什么想法吗？”我姐姐在第2个星期天继续问道。

“有。”我回答。

“是什么？”

我决定让她等一段时间。这些年以来，我们偶尔谈起罗伯特一

希尔玛。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养父母是纳粹分子吗？他们知道他不是雅利安人吗？如果知道，什么时候告诉他的？他具有内特家族的性格特征吗？他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军吗？他那时正值参加纳粹党的年纪。他的同龄人几乎都参加了青年军，他又怎么会例外呢？当他发现他的身上流着犹太人的血液时，他会承受这种打击吗？就像我听说的一件事：一个15岁的纳粹理想主义者，在与他母亲热烈地讨论纳粹主义的时候，他的母亲告诉他，实际上他整日叫“父亲”的那个人并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一个犹太人，她母亲的情人。孩子听完这些话以后，冲出门去卧轨自杀了。

希尔玛参加了德国军队吗？也许他参加了陆军元帅欧文·隆美尔在沙漠的战斗或者陆军元帅弗里德克·保罗斯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役，突然一个晚上，一伙人闯进营房，抓走他，后来被迫害致死。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反纳粹主义者，被占领国家的公民通常都知道自己受迫害的原因，但希尔玛知道吗？

这些问题我们常常问自己。但基于一些原因我们并不是经常提到布伦希尔德。

“布伦希尔德一定是个杰出的人。”我姐姐说。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说。

“是的，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姐姐继续说，“她爱上了一个她知道根本不可能与之结婚的人。而且在那个年代，与他恋爱是非法的、极危险的事情。那时候纳粹看起来似乎要赢得那场战争。”

她停了会儿，又问我：“你打算去找到她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回答道：“一定要。”

她一点儿也不吃惊。“如果她还活着，如果在电话中与她交谈觉得她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为什么不问问她是否可以让我们去看望她呢？”

“好主意!”

“明年夏天怎样?”

“行啊,到时候我会带上录音机一起去。”

我立即动手做这事。我想,在德国不会有很多叫布伦希尔德·内特的人。我查过了德国主要城市的电话号码簿,什么也没找到。我给在1951年,就是三十七年前代表布伦希尔德给安娜·内特的日内瓦律师写信的那名律师打电话。他仍然健在,并且是个和善的老人,现已退休。我告诉他我是加拿大的一名播音员,是布伦希尔德·内特的远房亲戚。他说十分抱歉,他已经记不起这件事了。毕竟,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我问他能否帮我找到她。他说他会尽力,但要我必须耐心等待。在德国这种事情通常会耗费很多时间。

一天之后他给我回了电话。我在华盛顿的姐姐同时也找到在德国北部,尤其是离莫恩不远的地方的基尔市,有一个叫布伦希尔德·内特的妇女的电话号码。在律师给我回电话时,她还没有和我联系。令人激动的是,律师也找到了在基尔市的布伦希尔德。

律师说,她不仅还活着,还与他谈这话。她答应与我通话。

我拨打她的电话时,心怦怦直跳。

一个老年妇女接了电话。

我首先作了自我介绍。我告诉她我是她的远房亲戚,我的继父是希尔玛母亲的哥哥。我说这可能是自1921年希尔玛被抱养后,内特家族的人第一次与她和她的家庭联系。

“有一点失望吧,不是吗?”她回答。

“不……,一点不。”我结结巴巴地说。

很显然,布伦希尔德这句幽默话带点讽刺。

“我和我的姐姐想见您一面。您看明年夏天行吗?”

“当然可以。”她的声音有点嘶哑。我想她抽烟抽得很厉害。

“我们还能见到您的孩子吗?”

“没有比这事更容易了。他们住的地方离我很近。”

第二章

奥德特

我必须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最近的一天,我去了珠宝商科克家。科克问我有没有时间,说有一样东西极想给我看。随后他带我进了一个小房间,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珠宝头饰!科克告诉我,这件头饰原属于俄罗斯公爵夫人的,在她丈夫被暗杀后,做了一名修女。她把她所有的珠宝都交给她哥哥——达姆施塔特附近的黑森大公爵——卖掉。这就是科克得到这件头饰的原因。

利拉·冯·迈斯特:《追忆集》

法兰克福,1910年。

奥托·科克,26岁,未婚,是拥有欧洲最大珠宝店之一的罗伯特·科克的指定继承人。那时他正与附近商店一个漂亮的售货员谈着恋爱。她是纽伦堡人,比科克大7岁。她怀了孕,于是奥托的叔叔路易斯·科克(自罗伯特·科克1902年去世后,他成了科克家族的当家人和珠宝店老板)就把她介绍给一个叫莫里茨·冯·莫克勒的男爵,他出身于德国南部的一个显赫家庭。莫里兹与她结

了婚。战争期间，莫里兹上前线时，男爵夫人和孩子就住在男爵祖上留下的乌尔姆附近的别墅里。

我爷爷罗伯特·科克完全是白手起家。他是医生的儿子，住在离魏玛不远的小镇上。他是朗第阿德人的后代(这种乡村犹太人的语言是依地语与当地方言的混合体。现在德国也不存在这种人了。在德国仅有的几千犹太人中，百分之七十住在6个城市的6个社区中)。

罗伯特有这种本事：他不靠巴结就能获得有钱有势的人的赏识。他是个算术天才，据说能心算出四位数的乘法，这大概归功于他在银行当过会计吧。除此之外，他还是个美男子。

他的侄儿，理查德·科克博士这样描绘过他：

他(罗伯特·科克)比一般人高，身材适中，明亮的深色眼睛，唇上胡须浓密。人们都说他极像拿破仑，但我却并不这样认为。依我看，他更像一名法国将军或法国外交官。他心地善良，对人友好，虽然他时常显得很严厉。他最大的爱好也就是骑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次在公园里见到他骑在马背上。

罗伯特·科克死时50岁。当时他的珠宝店正处于全盛时期，后来搬到凯撒斯特拉斯25号一座建于1875年，具有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式样的建筑物里。这幢房子的原主人是银行家卡尔·穆勒。设计者保罗·沃洛特也是柏林国会大厦的设计者。如今，这座建筑物被政府作为历史纪念馆保存起来，并把它出租给成立于1472年的一家银行分行。这家银行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银行。

罗伯特去世后，珠宝店移交给比他年轻10岁的弟弟路易斯打理。路易斯扩展了业务，并使珠宝店声名远扬。“科克的顾客往往延续了好几代人，”一个艺术史学家回忆道，“这些珠宝代代相传。我前妻的祖母给她的每个女儿都留下一些珠宝链，这些年轻姑娘还得到设计优雅的珠宝。”

路易斯·科克是个销售天才。当他与你交谈时，他会让你感到你就是他的整个世界。后来，他作为音乐手稿的收藏家的名声更大于珠宝商。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是一个手稿收藏家，曾这样评价过路易斯的收藏品：“这些东西可以展示欧洲的一段历史。”同时他还收藏有古代的戒指、字画和蚀刻。

路易斯收藏的音乐作品有：巴赫的大合唱曲、莫扎特的歌剧、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布雷厄姆的《第二交响乐》、舒伯特的钢琴协奏曲。

罗伯特和路易斯·科克被称作“宫廷珠宝商”。在德国国内和国外，他们在很多王宫都享有特权。要做到这一步并不容易，路易斯和罗伯特对此曾仔细计划过。理查德·科克博士还是个学生时，就对叔叔路易斯十分崇拜：

他在一个上等军团服兵役，他是怎样负担起这笔昂贵的费用的我不得而知。这个安排使奶奶和罗伯特叔叔十分中意，因为这样使他跟很多上流社会的人结识，而这些人都成了他日后珠宝店的老主顾。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无法当军官，这个事实又不可能改变。他是个举止高雅、热情优秀的年青人，也是一个好骑手。我喜欢这个穿着浅蓝色和黄色军装的叔叔。

后来连凯撒皇帝也成了他的客户之一。在珠宝店隔壁有一间布置奢侈的房子，据说皇帝被废黜后，来法兰克福就住在那儿。我不能证实他是否真的进过那间屋，但毫无疑问无论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还是帝国时期，这都是一种公关手段。我记得在我和我兄弟放玩具的壁橱里，有一张铅笔画的头饰草图，据说是准备送给皇后的。我们的女管家神情庄重地告诉我们，这是皇帝亲手画的。

如果皇帝不仅仅是在私下对他的亲信表明他激烈的反犹太主义的观点，而且将它公之于众，正如他的继任者一样，那么，我怀疑我们家族是否还会把科克与皇帝的交往引以为荣。根据英国历史

学家约翰·C·G·罗尔的最新研究，皇帝的许多反犹观点与后来希特勒的观点如出一辙，其中包括使用毒气来最终处决犹太人。

他在考虑一个周全的计划来消灭犹太人，他在1929年夏天写道：“犹太人就像蚊子一样，都是一种害虫，人类必须通过某种方式除掉他们……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使用毒气……”

他兴奋地给他姐姐写道：

“一旦战争爆发，上帝之手就会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将建立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欧洲联盟，一个统一的欧洲大陆，这是任何人都不敢想像的。”他毫不掩饰地又写道：“犹太人将会被剥夺权利和地位，那他们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给其他国家带来灾难和祸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467名犹太人为“祖国”德国献出生命，但“祖国”并未善待他们。有些人并未把皇帝的话当真，仅认为是狂妄之语。毕竟，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不会想到使用毒气——直到有人真正这样做了。而且，在有些场合，他对犹太人问题上表示出比较温和的态度。据约翰·C·G·罗尔描述，当皇帝年老时，他对犹太人的态度远远比当时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那些上流人士的反犹太人观点仁慈得多。

科克一家认为那些“反犹太”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始终乐观地相信，理智、忍耐和宽容会战胜偏激与仇视。

帮助我祖父事业成功的那个女性叫玛丽·贝顿公爵夫人，史蒂芬·博哈内斯的女儿和约瑟芬·波拿巴的侄孙女。罗伯特·科克使玛丽着迷。玛丽住在贝顿，在那里罗伯特·科克开了一家分店。她把科克引入上流社会。每年那些达官贵人们都要在贝顿来

进行赛马比赛和赌博。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比给自己的妻子、女儿和情人们送珠宝首饰更好呢？

波拿巴这个名字对罗伯特和路易斯·科克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科克一家非常想得到证明他们是拿破仑的直系后代。罗伯特的遗孀，也就是我祖母在法兰克福公寓的墙上贴满了拿破仑的像。路易斯叔叔收集了拿破仑的许多信件，其中有一封信是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信笺纸写的，上面还印着“自由、平等、博爱”几个字。在这封信中，年轻的将军请求约瑟芬在米兰与他见面，以便他们能重温新婚的快乐。

拿破仑是怎样与科克家族发生联系的呢？科克是这样讲的：

罗伯特·科克的祖父舒默尔住在斯德特朗夫，这个小村庄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他的妻子叫埃斯特，我听说他们死后葬在村外犹太人的墓地里，但我于1989年去过那里，并没有找到他们的墓碑，因为他们的墓碑年代久远，而且碑文都是用希伯来语写的。

埃斯特一头红发，身材颀长，非常漂亮。斯德特朗夫离吉纳不远，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在这里击败了普鲁士人。据说拿破仑有一个习惯，无论他在哪里打了胜仗，他都要士兵去寻找当地最漂亮的姑娘与他一起庆祝胜利。埃斯特受到了邀请，我的曾祖父赫尔曼无疑就是她与拿破仑的儿子。

赫尔曼是学医的。很可能是拿破仑的后裔资助他完成学业。

在1900年前后，有人见到过赫尔曼·科克的墓碑，碑文上写着他生于1808年12月4日，即拿破仑吉纳战役后26个月。但他从未声称自己是拿破仑的儿子。

理查德·科克回忆到：

当我祖父10岁时，拿破仑被流放到圣海伦娜岛。也许他在莱

比锡战役前后见过拿破仑。对于犹太人来说，拿破仑是他们的救星，因为他每到一处都把犹太人从集中居住区中解救出来。而且他以自己经历证明了：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也会在短短几年之内达到权力之巅。基于这个原因，犹太人对拿破仑的崇拜几乎到了宗教般的虔诚。他们心中的英雄被击败，被流放至大洋中的一个荒凉的小岛上，这反而使拿破仑的形象更加光辉。只要他活着，许多人就相信他还会卷土重来，会击垮他的敌人。

后来，我祖父曾告诉过我们他是怎样在家里的一个角落的桌上就着烛光学习的。很遗憾，对他的童年生活，我了解不多。我只是从他的学生时代开始了解他的。可以想象，一个生活在黑暗、狭窄房间里的男孩，一定是个坚强、健康的人，他没有那些虚伪的言行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是一个意志坚强、有正义感的人，因此，大多数人认为一个犹太男孩必须忍受的嘲笑和折磨对于他来说是不公平的。他很早就发现，强壮的身体和坚强的毅力是最好的武器。

这就是说，坚强的意志不仅能帮助保卫自己，更重要的是，一旦你进入上流社会，它能捍卫你的权利。我的曾祖父在盖沙镇上当了 34 年的医生，他的后代都是珠宝商，以飞快的速度发迹。到 1913 年，他们都成了百万富翁。

同年，他们向圣·伊丽莎白医院捐建了一个手术室。为了纪念他们，这家医院在正门上挂了一块匾。在纳粹执政期间，这块匾被藏起来了。战争结束后，这块匾再次挂回原处。

科克一家到底有多少犹太血统？赫尔曼·科克懂希伯来文，但他很少去犹太教堂。

他是经人介绍与我曾祖母雷吉娜·法兰克结婚的。我曾祖母的家境比他好。她的父亲是个富有的商人，从事珠宝商和酒类生

意。后来他破了产，所以他的女儿不得不下嫁一个小镇医生。但他们很快就相爱了。他们共有9个孩子，有5个活下来了。1870年，赫尔曼死于心脏病。他的孩子们都非常崇敬他。

下面是理查德·科克的另一段回忆：

我曾祖父经常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出诊。在山区里，这种出诊是非常劳累并充满危险的。我曾祖母常常对我们讲在那样的夜晚她是多么担惊害怕。她经常在夜晚为她丈夫祈祷。她按照犹太人的习惯来布置房间，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取悦丈夫的犹太病人。

科克死时几乎身无分文，因为他经常免费为人看病。他死时罗伯特18岁，路易斯8岁。母亲带着他们和其余3个孩子移居到法兰克福。她希望在那里为女儿找个有钱的丈夫，为4个儿子找到有钱的妻子。后来她女儿——一个有天赋的钢琴家，的确找到了有钱的丈夫，一个匈牙利珠宝商。后来他对罗伯特·科克帮助很大。

她的4个儿子都找到了体面的妻子。罗伯特·科克娶了弗洛拉·卡西尔，她的父亲莫里斯·卡西尔与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一起签署了关于授予法兰克福犹太人民权的文件。

那么这样看来，科克一家到底有多少犹太血统？

我曾祖父这一代虽然与犹太教的关系慢慢减弱，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犹太人。虽然他们过着现实而非宗教的生活 但他们并不愿意承认。只要他们宣称自己是犹太人，要让他们改变信仰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与非犹太人几乎没有什么交往，更不与他们通婚。

1890年，理查德·科克开始读书：

家里所有的熟人都是犹太人（但我们尽量避免依地语），只有

一个例外。在路易斯叔叔的珠宝店里有一个非犹太人雇员。由于他认识许多犹太商人，他对依地语有很深的了解。因此我们极力回避的依地语又重新进入家庭。我叔叔是第一个积极倡导使用依地语的人。他喜欢在庄严的场合使用依地语。他的儿子，奥托和迈克斯也效仿他。但家里的妇女们抵制了很长时间。我母亲总是对我讲：“要么你说德语，要么你说希伯来语……”

虽然有许多资料显示反犹主义使犹太人深受其害，但对我们一家并没多少影响。每个人对我们都彬彬有礼，每到一处我们都受到热情接待……但即使是这样，我们家里的成员都不爱与非犹太人交往。

我父亲十几岁时喜欢嘲笑家里的日耳曼血统论者，当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不愿意被人提及他是一个犹太人。但从下面这段鲁道夫·宾德的《西线战争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从未否认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我认为在战争期间，任何人只要表现突出，都应该得到提升。我曾推荐过几个犹太人，但我想不通为什么几乎没有犹太人具有当军官的资格。

法兰克福，1910。

当埃米·赫尔德发现自己怀孕后，她告诉了我父亲。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我猜想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父亲去找了路易斯叔叔，他有两个女儿，他把我父亲看作他的儿子和继承人。

“你还记得埃米吗？”我父亲问道。

“当然，她是一个可爱的姑娘。”

“她现在怀孕了。”

路易斯叔叔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孩子，不要为这事担忧，”他说，“相信我，我会处理好这一切。现在你回商店上班去吧。”

路易斯叔叔认识一个年轻的男爵莫里兹·冯·莫克勒，这个男爵所在的公司与路易斯叔叔有业务往来，因此叔叔就把他和埃米撮合在一起了。

路易斯叔叔这件事做得很成功。孩子出生以后，男爵同意埃米把他取名为奥德特（是根据奥托·科克名字来的）。事实上，男爵的一些朋友怀疑他不是孩子真正的父亲。

这对年轻夫妇在法兰克福住了三年，抚养奥德特，并经常一起出去远游。由于法律上的一些原因，他直到1914年10月才与奥德特正式结婚，婚后不久他就上了前线。

男爵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世纪的法国。家族的祖先之一弗里德里克男爵是一名普鲁士军官，参加过七年战争，并写了一部回忆录。他的儿子尤金是司法部长，在拿破仑时代留下了许多文学作品。

男爵莫里兹1888年生于维也纳，他的父亲是驻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大使。

他们居住的城堡建于1588年，靠近乌尔姆，在一座陡峭的山上。从城堡望出去可以俯瞰劳特河。

他们家在城堡里住的时间很少。因为住在城堡里与世隔绝，交通不便。在夏天只有乘马车，冬天只有坐雪橇才能到达。

为什么男爵会娶一个社会地位低，并且已有身孕的女孩呢？

找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也许他想找一个成熟的女人来照顾他——埃米比他大11岁；也许他很孤独：他母亲死于1900年，父亲死于1907年；也许他需要钱——这些年轻贵族常常欠有一身赌债，路易斯叔叔可能帮了他的忙；也许他是一个同性恋者，这段婚

姻可以为他遮掩。(埃米没有再怀过孕。)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我们也不会知道埃米·赫尔德的感受。她为了纪念奥托·科克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奥德特。她这样做是否为了提醒她的情人对这孩子有责任?她有这个必要吗?我父亲没与她结婚她是否感到绝望?她想过我父亲要跟她结婚吗?

我想我父亲可能从未表示过要跟埃米结婚,但是没有人能证明这一点。显然我不愿相信我父亲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当然有可能——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他很想跟埃米结婚,但路易斯叔叔阻止了他。虽然在一些小事情上我父亲会听命于他的叔叔和老板,但这种婚姻大事就很难说了。他的孩子取名叫奥德特,他是高兴还是尴尬?他怎么能够在他孩子出生的同一年与我母亲结婚?在他结婚后他是否还对埃米和奥德特有感情?

在1914年以前的欧洲,一个富有的年轻男人在婚前与某个女人有关系,而基于某些社会因素未与她结婚是很普通的事,也不会被认为不道德。这种事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评判。如果有了孩子,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应该承担对母亲和孩子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社会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1918年6月,男爵莫里兹·冯·莫克勒战死在前线。

第三章

那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生子容易养子难。”

教皇约翰23世

1921年1月，内特开始寻找一个能够收养海伦娜的私生子的家庭。她们的朋友凯蒂·赖克夫帮他们办理这件事，凯蒂·赖克夫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为法兰克福一个名叫“保护母亲”的组织服务。不久，一个名叫雨果·韦尔克的路德派教士和他的妻子赫德韦格表示愿意领养，他们住在柏林东部的菲尔斯滕伯格，离法兰克福比较远。

下面的这些信都是凯蒂·赖克夫写给雨果·韦尔克夫妇的，内容稍微有些缩减：

法兰克福

1921年3月2日

亲爱的韦尔克：

我已经收到你于1月26日发出的信并且把它交给了孩子父

母的家人。

这个孩子现在仍在国外，孩子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回德国，因为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的不幸。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孩子还没有指定的监护人。这个孩子是德国国籍。

关于领养一事，我建议采取以下程序：如果可能而且你们也愿意，我先把孩子带到你们家，然后法庭会指定一名监护人，最好是一名律师，他会作为孩子的法律代表与你们商定一份领养协议。按照德国的民法典，孩子一旦被领养，所有继承权将被取消。

随信寄上两张孩子的近照。

法兰克福

1921 年 3 月 9 日

亲爱的韦尔克：

3 月 5 日的信已经收到，我们完全同意指定曼哈特律师作为孩子的监护人。

孩子正式登记的教名是罗伯特。

很遗憾我不知道你和你妻子是否喜欢上次我寄去的两张照片。

在适当的时候，我，或者我的代表将去菲尔斯滕伯格与你商讨领养的细节问题，可能曼哈特律师也在场。

法兰克福

1921 年 3 月 16 日

亲爱的韦尔克：

因为近段时间工作繁忙，我决定派我的朋友冈瑟博士下个星

期日去你家与你讨论领养的细节问题，他希望律师曼哈特也能到场，这样进展会快一些。冈瑟博士这次是去柏林出差，时间有限，他定于下个星期日到菲尔斯滕伯格，但星期一得返回柏林。

请你帮冈瑟博士联系一家合适的旅馆，然后给我拍封电报，因为他不愿意到你的住宅麻烦你。

法兰克福
1921 年 3 月 24 日

亲爱的韦尔克：

冈瑟博士向我详细讲述了他的菲尔斯滕伯格之行，我非常感谢你和你的妻子对他的热情款待。

在领养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将努力尽早把孩子送到你家，我希望在下周内能完成这件事。日期一旦确定，我会立即派一名可靠的保姆把孩子送过来。

法兰克福
1921 年 3 月 27 日

亲爱的弗诺·韦尔克：

如果一切顺利，一位名叫弗劳宁·埃尔斯·穆勒的保姆 3 月 31 日的晚上把孩子带过来，她将在 7:54 分到达柏林的巴恩霍夫·弗里德里克斯特拉斯车站，你最好 3 月 31 日就到柏林，以防保姆路上有耽误。到达柏林后，你可以从柏林拍封电报告诉我你的地址，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及时通知你。按计划，你可以在巴恩霍夫·弗里德里克斯特拉斯车站的二等车厢候车室见到保姆，请不要告诉保姆你的姓名及地址，因为没有必要让她知道孩子的去向，

而且她也不知道孩子的姓名。

法兰克福
1921 年 4 月 18 日

亲爱的理文德·韦尔克：

电报已收到，我很高兴地得知孩子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随信所附孩子的出生证明，我很晚才从孩子的亲生父母那里得到。信中还附有她母亲海伦娜·内特的证明。你可看出这个孩子是个德国公民。一旦收养被确认合法，你能否为这个孩子在普鲁士重新登记？这样就没人知道孩子的过去了。

我衷心希望你们能把孩子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能给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我祈愿这个孩子也能给你们带来欢乐，以此作为对你们的报答。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凯蒂·赖克夫和韦尔克一家的信中主要都谈法律和经济上的事，有时语气比较尖锐。律师曼哈特博士认为内特付给孩子养父母一家的费用太少，在法官的提议下，他要求海伦娜·内特给他寄一份财产证明书。

律师认为，内特至少要付 10 万马克。“父母虽然犯了错，但孩子是无辜的。”他写道，“这也是法官的观点。这个孩子同样也是母亲经过十月怀胎，承受了分娩的阵痛后才来到人世上的，跟任何合法的孩子一样。”内特家回信说，对律师的要求他们已认真考虑过了，但他们最多只能付 45,000 马克现金和 35,000 马克的战争债券。他们希望这笔钱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也减轻孩子生母的痛苦。

他们在信中从未提起过海伦娜·内特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

病。

1922年1月2日，海伦娜·内特死于达沃斯。

凯蒂·赖克夫的下封信是三年半后的事了。

法兰克福
1925年7月9日

亲爱的弗诺·韦尔克：

你在7月4日的信中提到你的养子也许不会理解为什么他会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而他的亲生父母却衣食不愁。

可能我得提醒你，4年前我对你谈到的关于这个孩子的那些事完全是真实的。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他的母亲是在被人用药弄昏之后遭人强奸的。直到她的母亲找到她时，她仍躺在旅馆的床上——人事不醒。更惨的是，她记不清任何事了，甚至那个男人的名字。为了掩盖这个丑闻（这种事肯定会玷污年轻女孩的名声），同时也不知强奸者是谁，所以他们没有报警。

这件事毁了这个漂亮又极有天赋的女孩的一生。我们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生出的孩子肯定得不到母亲的爱。

况且，她的前途被毁并不是她的错。

海伦娜无法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1921年夏天，她的一位朋友让她去荷兰度假。在那里她生病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到瑞士养病。1922年1月，她结束了她悲惨的一生。

她用了她1/4的财产付给孩子的养父母，剩下的钱全都用在治病上了。她的母亲是个寡妇，还有一个身体状况极不好的儿子需要照料。同你一样，她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她女儿出了这种事让她无心照料她的投资。现在她甚至连谋生都有困难。简而言之，

她现在没有能力为这个孩子支付金钱。

我认为没有必要为这件事而争执。很遗憾，孩子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没有预见到现在严重的通货膨胀。

我可以告诉你，鉴于这种微妙的家庭关系，孩子的生母家庭是不愿意再付钱给你的，甚至在道义上她们也不会支持你的这种要求。

我相信你也不想再给孩子的生母家庭增加负担，而且你很爱这个孩子，也不愿为他的抚养费而打官司。当然我也不会完全拒绝你的要求，我希望你丈夫的病能尽快好转。而且在以后一段时间里，我会定期寄给你一小笔钱，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但请原谅我不能一直给你寄钱，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宽裕。请把孩子的身材尺寸寄给我，我准备给他做一些衣服和鞋子。

最后祝你丈夫早日恢复健康。

1925年10月，凯蒂·赖克夫辞去了她在“保护母亲”组织里的工作，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觉得形势的发展变化使她不能继续她的社会工作。从那以后，她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事情上，而且她请求弗诺·韦尔克不要再向她提出任何经济上的要求。一年之后，雨果·韦尔克去世，留下他的妻子独自照料希尔玛和他们收养的第二个孩子霍斯特。

1929年弗诺·韦尔克给凯蒂·赖克夫寄去了两个孩子的照片，凯蒂·赖克夫立即回了封信。

法兰克福

1929年2月2日

亲爱的弗诺·韦尔克：

感谢你的信和寄来的照片。孩子们长得很可爱，他们肯定给你带来了很多快乐。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以后他们就能够报答你的母爱。希尔玛是一个漂亮的男孩，我希望他同时也是一个聪明、上进的男孩，长大后会成为有用之材。

希望你们母子能平安度过这个严冬。

我记得凯蒂·赖克夫，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圆脸、双下巴和高大的身材。三十年代早期，她经常和我的三个祖母：我父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和海伦娜的母亲一起打桥牌。对她在“保护母亲”组织里工作的这一段经历我一点也不了解，而且我当时还是个学生，没有理由对她的过去感兴趣。

一定是出于她与安娜·内特的友谊，她才在1921年帮忙联系领养希尔玛的事宜。安娜·内特对我们很好，但缺乏一些祖母般的慈爱。在生活中，她主要对食品和购买食品感兴趣，她也喜欢做假花，这在当时是一种少见的爱好。

虽然凯蒂·赖克夫是犹太人，但“保护母亲”组织不是一个犹太人社团。这个组织成立于世纪之初，成员主要是热心社会工作的妇女。1922年，这个组织开始成为法兰克福市福利系统的一部份，直到1930年组织解散。

战后，我得知凯蒂·赖克夫没有被驱逐到东边就自杀身亡了。在她和其他许多人一起被卡车载到法兰克福火车站大厅的时候，她放弃了所有的希望，然后服毒自杀。当我刚开始读凯蒂·赖克夫与韦尔克的通信的进候，我老是想到火车站里凯蒂·赖克夫自杀的情景。1933年，我来到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博物馆，向馆内的历史学家理纳兹了解当时的情形，他说他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我告诉他我见过凯蒂·赖克夫的坟墓，上面的死亡日期是1942年7月2日。他查了历史文件，上面显示7月2日之前的一次驱逐几周前就

进行了。理纳兹解释说，有可能凯蒂·赖克夫在火车站服毒自杀，然后被火化，骨灰一直到7月2日才安葬。

但事实的真相，我已无法查明。

希尔玛是在1920年1月10日出生的，为什么直到1921年2月，“保护母亲”组织才开始为他寻找领养家庭，而且很凑巧正式领养直到1921年9月22日才开始呢？

这就是说，整整11个月没有人为这个孩子的将来做出决定。埃米尔·内特告诉我的母亲，孩子出生后不久，曾经被安娜·内特的保姆安娜·波尔带到阿尔萨斯抚养过一段时间，孩子出生很久以后才决定给人领养。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海伦娜被发现染上了结核病。孩子被正式领养的三个月之后，海伦娜死于结核病。

如果我能找到安娜·波尔的后代就好了。战争结束后，她在法国去世，她的家人可能保存有她的日记和信件，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身材高大、非常健谈、脸色苍白、头发又黑又直。她对我们都很疼爱，而且还帮助过我学习法语。如果能够找到她的后代，我就有可能了解清楚海伦娜是否想到过要抚养这个孩子，她的家庭是否考虑过流产。

如果我能找到安娜·波尔的日记，我还能弄清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1919年3月海伦娜出事的时候，她也住在那家苏黎世旅馆。虽然她对内特家是绝对忠诚的，但她是整个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如果事件的真相不是像凯蒂·赖克夫对韦诺·韦尔克所说的那样，那么从她的日记中一定能看出这一点。

有时我甚至认为强奸事件完全是捏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掩盖海伦娜与某个男人的婚外情。虽然这只是一种大胆的猜测，遭人强奸当然是一桩需要掩盖的丑事，但如果海伦娜与某个已婚男人

发生关系，情况就更糟糕了，整个家庭当然会极力遮掩，而且凯蒂·赖克夫出于与内特家的友谊当然会尽力帮忙。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与内特家其他孩子一样，海伦娜染上了结核病，最后因结核病死于1922年1月2日。但她的早逝仅仅是因为结核病，而与这场灾难对她的心理打击无关吗？毕竟她的兄弟埃米尔并没有因结核病而丧命。

除了放在继父桌上她的相片之外，海伦娜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她兄弟每次说起她，都禁不住要说：“可怜的小海伦。”

为了能给布伦希尔德和她的两个孩子找一张希尔玛母亲的照片，我给分布在英国、瑞士和美国的内特家族成员写信，但都没有成功。这让我感到非常迷惑，一个只比我大二十多岁的人居然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但我还是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海伦娜的一个远房侄子告诉我，1919年3月以前，海伦娜一直被当作他们行为的楷模，而1919年3月正是苏黎士旅馆事件发生的时候。这意味着旅馆事件是一桩大家都极力掩饰的家庭丑闻，因此强奸很可能是编造的谎言。

我还了解到其他一些信息。在海伦娜去世之前，她本来打算与著名歌手玛丽亚·伊沃冈的兄弟订婚，这有可能吗？后来我得知伊沃冈在1987年才去世，我刚好错过向他了解他兄弟与海伦娜订婚一事的机会。伊沃冈断断续续地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歌剧团工作，我给歌剧团去了信，不久之后他们答复说从来没人听说过伊沃冈有个兄弟，只知道他的原名叫伊尔斯·坎普纳，出生在布达佩斯，他的母亲也是一名歌手，名叫艾达·冯·冈瑟。

冈瑟，这不是凯蒂·赖克夫的代理人的名字吗？

当然，世界上有许多叫冈瑟的人。

但我后来得知，1921年奥地利驻法兰克福总领事与凯蒂·赖克夫是朋友，这位总领事的名字就叫冈瑟。

我立即给维也纳方面去了信，我得到的答复是1916年至1921年奥地利驻法兰克福总领事的名字叫奥托·冈瑟·瑞特·玛·奥伦堡格。

根据我所掌握的所有情况，我对当年发生的事作出了以下推测：总领事冈瑟（他也许是玛丽亚·伊沃冈的亲戚）和海伦娜发生了关系，后来海伦娜怀了孕，他当时是非常愿意娶海伦娜的，因为海伦娜是一位富家女孩，而他自己是一个贫穷的维也纳人，虽然有总领事的头衔。但不幸的是后来海伦娜染上了结核病，冈瑟在痛苦与犹豫中度过了十一个月，最后他终于决定不娶海伦娜。最后内特一家不得不请凯蒂·赖克夫与韦尔克谈妥之后，冈瑟亲自到菲尔斯滕伯格去了解韦尔克家的情况，既代表海伦娜，同时也代表他自己。

这种推测看起来很合乎情理。

第四章

那好吧，她叹息道。明天过来喝茶吧

我只有一个活着的亲戚还记得我父亲：他是我的堂兄弟，已经90多岁了，早年他移民到荷兰，战争期间在德国集中营关押了一年。所幸的是他并未被驱赶到奥斯维辛去。在韦斯特伯格他认识了安娜·法兰克一家，他们同样来自法兰克福。安娜·法兰克的父亲参加过我父母的婚礼。

我父亲死时堂兄已经18岁了。父亲的照片放在堂兄家的壁炉架上，每次去德国，我都要去看我的堂兄。

我是在1985年第一次听他说起奥德特。

有一次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在与你母亲结婚之前与另一个女人发生过关系？"

"不知道，你从前从未告诉过我。"

"他们还有一个女儿。"

"嗯。"

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故事，故事的情节我已在第2章讲述过。我们既佩服路易斯叔叔做媒的天才，又对他处理这事的作法感到惊奇。这种事情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叔叔的撮合的话，通常结局都很悲惨。路易斯是个对人和蔼但性格武断的人。我堂兄说，我父亲可

能有点怕路易斯叔叔。但在这件事上，他一定很感激我叔叔。我堂兄还说他不想在我母亲活着时提起这件事，他现在告诉我是因为我母亲于4年前去世了。

“你认为她知道这事吗？”我问。

他摇头。他可以确认我母亲对这事一无所知。

我对自己这种无动于衷感到奇怪，仿佛是很久以前发生在另一个星球的事。很多年已经过去，这期间发生了两次战争。这件事多少让我改变了一些对父亲的印象。我从不认为他是个纨绔子弟，但我认为在这件事上他应该负点责任。我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因为这件事让我感到有趣而不是难过。

“你还应该有个姐姐，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让我想想……她多大了？”

“她生于1911年。现在已经74岁了。”

“你知道她的情况吗？”

“我知道。我还记得路易斯叔叔给她母亲介绍的男朋友的名字：莫克勒。”

我让他把这个人的名字全部写出来。

“冯·莫克勒”他说，“这是在当地最显赫的家庭。”

我把这个名字写在纸上。

“我想她现在可能不用这个名字了。当然没人敢肯定。我想在她这一生中可能不止一个丈夫。”

我回到加拿大立即给住在华盛顿的姐姐和洛杉矶的哥哥打电话，告诉他们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短时间的震惊之后，他们表现出的兴趣超过了不安。

我们3个人都没想到要与她联系。直到4年以后，我们想去找到希尔玛的遗孀时才想到了她。我们想，既然我们已经又回到了德国，不花点精力去找到她呢？

我再也找不到那张记下她名字的纸片了——这无疑是个损失。我只好再次去找我的堂兄。

他的屋子里到处堆满了书。我告诉他我想打听的事，他爬上梯子从书架的最上面取下一本书，是男爵弗里德里克和男爵尤金·冯·莫克勒写的回忆录，1985年才出版。他指着编辑保罗·索耶写的前言。在前言中，保罗·索耶感谢弗诺·玛亚·冯·莫克勒，她给他提供了这两个男爵的手稿。她是冯·莫克勒家族的成员，还活着，住在乌尔姆附近的赫林根。

赫林根肯定在冯·莫克勒的城堡的附近。

“如果我是你的话，”堂兄说，“我就从这条线索开始。”

这是个好主意。反正两天后我就要到乌尔姆去和一个老朋友见面。

那天很热。我在车站给她打了电话。

我仔细考虑过该怎样跟她讲。

“我是个加拿大作家，”我说，“是法兰克福人。我在加拿大住了50年。我父亲死于1919年。我现在回到德国来寻找他的足迹。”

“是吗？”

我极力使自己的话听上去不至于让她感到太荒谬。我接着说，“我听说在1914年我父亲与一个叫莫里兹·冯·莫克勒的人有些关系。我想你是否了解他的情况。”

“当然知道。”她丝毫没有迟疑地回答道。“但你找错人了。你应该去问他的女儿。她是我堂妹。但不巧她刚离开。她在这儿跟我住过一段时间。”

“他的女儿？”我顿时感到心跳加速。

“是的，她叫奥德特。奥德特·埃伦斯。”

我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她现在在哪儿？”

“她住在慕尼黑的老人公寓。你想要她的电话吗?”

跟我朋友吃饭时我老想着这事。吃完饭我立即乘火车赶往慕尼黑。我女儿也住在那儿。那晚在我女儿家我给奥德特·埃伦斯打了好几个电话,但都没有人接。等待是件痛苦的事。

最终我接通了电话。她的声音很动听,说话很有教养。

我先告诉她我的姓名和我是怎样得到她的电话号码的,然后我说我是法兰克福人。

我认为她会说:“哦,你是法兰克福人,这太好了,我父亲也是法兰克福人,他叫赫尔·科克,你会不会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但她并没有这样说。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她的语气有点冷淡。

“我想,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父亲与你父亲有些关系。”

“亲爱的科克先生,”她说,“那可是很久很久的事了,那时我还没出生呢。很遗憾我不能帮你。”

她想挂电话了。

“但埃伦斯女士,这事很重要。我很想与你见一面。”

“科克先生,等天气凉快下来再说吧。而且这星期我都有安排。你可能得耐心地等一两周。”

“星期二我就要回加拿大了。”

她听出了我急切的语气。

她犹豫了很久,最后说:

“那么你明天过来喝茶吧。”

第五章

基尔，1989年7月初

当我和姐姐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来到布伦希尔德家时，令人奇怪的是在她家门上看到我母亲内特的名字。

我们前一天到达汉堡，乘火车至少要3小时。格德鲁恩在车站接我们，她漂亮、可爱、衣着时髦。她给我们的感觉象一个地中海国家的人而不是德国北部人。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她。她领我们住进了她预订好的旅店，然后就带我们去见她母亲。

一见到布伦希尔德，我的紧张感立即消失了。毫无疑问，她同样有点不安，但她极力克制自己，平静、热情地接待我们。从她饱经风霜的脸上可以看出她曾经历经艰辛，但她没有丝毫的自怨自艾。希尔玛死后，她没有再结婚。

一连三天我们都坐在布伦希尔德家的阳台上谈话——面前是她家的花园。她告诉我们，总是她一个人打理花园。我把我们的谈话用录音机录下来，天空中不时传来鸟儿的鸣叫。天气真好。格德鲁恩经常从位子上跑出去看网球赛。第二天下午，格德鲁恩的哥哥、嫂嫂也来了。在我们来她家的前几个月就开始通信，所以对她家的一些情况都已了解。她的儿子和媳妇都从事电教设备的经销，女儿是一家从事开发和经营医疗设备的公司的经理。

后来，我姐姐和我都在追寻希尔玛的两个孩子与他们的曾祖母安娜和叔叔埃米尔是否存在相似之处。我姐姐认为希尔玛的儿子克劳斯·迪耶特的举止和言谈与埃米尔·内特很相似——那种商人的自信——但我不这样认为。很可能格德鲁恩的美貌是海伦娜的遗传，但这仅是猜测。格德鲁恩长得很像她的父亲，布伦希尔德给我们看过希尔玛的照片。

布伦希尔德给我们端上冰柠檬茶。

对我们想知道的问题她迅速而平静地回答了，这令我们很吃惊。希尔玛是什么时候，怎样知道自己的母亲是犹太人的？这是否令他感到不安？如果是这样，他对犹太人了解多少？其中，我们最想知道他是否曾是纳粹党人。

但最让我们吃惊的是布伦希尔德谈到养母弗诺·韦尔克的情况。

她的生活很悲惨。她后来几乎变成一个精神病人。战争期间她因伪造罪被关押了6个月，后来又在精神病医院呆了几个月。但绝大多数时候她看起来与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希尔玛一直都很爱她，因为他并不知道弗诺·韦尔克不是他的亲生母亲。

但韦尔克并不喜欢希尔玛，因为她收养希尔玛时，希尔玛已经1岁多了。但她并不恨他，只是不喜欢他而已。但1943年希尔玛的儿子出世后，弗诺·韦尔克变得很恨他了。她对希尔玛常常显得很冷漠和疏远，希尔玛对她关心她也无动于衷。有时她还恶意地给他制造麻烦。

我们与布伦希尔德的朋友莎拉·弗朗克也进行过交谈。她也同意布伦希尔德对弗诺·韦尔克的描述。她说，有时你可以与弗诺·韦尔克进行正常的交谈，但有时她又会突然失去理智。

弗诺·韦尔克似乎对领养的手续了解得很清楚。她自己也是被人收养的。她曾经告诉过她的朋友，她的亲生父亲是一个船长，

后来在一次事故中丧生。父亲死后，她在孤儿院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她三岁时，一个路德派牧师正式收养了她。

1924年，弗诺·韦尔克收养了第二个孩子霍斯特。当时霍斯特才出生两星期，而希尔玛已经三岁了。他与霍斯特相处得很好。弗诺·韦尔克与霍斯特感情很好，从一开始她就喜欢霍斯特而疏远希尔玛，原因之一可能是霍斯特的亲生母亲是弗诺·韦尔克的朋友。

霍斯特被允许呆在家里，而希尔玛则被送出去读书。开始是在波茨坦的一个男子学校，后来又在上西里西亚的一个寄宿学校。在这两个学校里，希尔玛都很孤独，而且很想家。

她丈夫死后的一段时间，弗诺·韦尔克的处境很困难。她不得不偶尔出去工作。1932年她告诉布伦希尔德，她爱上了一个甜言蜜语的男人。那个男人答应与她结婚，后来却骗走了所有内特给她的钱。她到法院告过那个男人，但没有成功。

韦尔克是不是为了钱而收养希尔玛？我找不到证据。布伦希尔德认为1926年以后，弗诺·韦尔克对希尔玛的态度有所变化，可能是因为她觉得把内特给她的钱全部花在霍斯特身上令她感到良心上的不安。在1921年，这笔钱对于一对小镇上的牧师夫妇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后来，弗诺·韦尔克离开菲尔斯特伯格到斯德丁定居，在这里她开了一间女子学校。

弗诺·韦尔克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吗？

不是。布伦希尔德和莎拉·弗朗克都不记得弗诺·韦尔克曾有过反犹言论。有一次，她告诉布伦希尔德她以护士的身份帮助过许多犹太人。布伦希尔德认为这事很有可能。她解释说，弗诺·韦尔克还是有一些高尚的品德。但另一方面，如果为了帮助霍斯特，她也会用尽一切手段，甚至不惜以希尔玛为代价。

有一段时间她是一名纳粹党人，她参加纳粹并不是因为她信仰纳粹主义，而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后来她被驱逐出纳粹党，可能是因为未交党费，或者与某位纳粹要人发生矛盾。

她知道内特一家是犹太人吗？

在二十年代早期，一个牧师家庭只会从宗教而非政治的角度上考虑这个问题。当韦尔克牧师发现希尔玛没有洗礼证书的时候，也许怀疑过希尔玛的血统。另一方面，希尔玛没有实行割礼，很可能希尔玛被收养不久进行过洗礼。但是布伦希尔德没有洗礼证书，只有法院颁发的法律登记文件，日期是 1921 年 9 月 22 日，上面的姓名是希尔玛·罗伯特·阿尔弗雷德·韦尔克。

希尔玛参加过纳粹党吗？

没有。但布伦希尔德认为他肯定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军——在他发现自己是个犹太人前。虽然青年军不是强制参加，但学校里有许多象希尔玛这样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虽然布伦希尔德不了解希尔玛在寄宿学校的情况，但她记得希尔玛曾给她看过一张他学生时代的照片——那时他身着青年军的制服。希尔玛是个孤独的人，对同龄人热衷的事都不感兴趣。

在德国有一种惯例，不能告诉收养的孩子他们是被人收养的。当希尔玛得知自己血统不纯时，布伦希尔德认为他的反应一定很困惑。像纳粹时代的其他孩子一样，希尔玛在学校里要学习人种生物学，他从未想到过自己会是劣等人。他的自信并未因为自己是个犹太人而受到影响。他并不能理解，如果自己是个犹太人，这意味着什么。

我想，在 30 年代中期希尔玛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人能告诉他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犹太人会被剥夺权利。在战争期间，他常常让布伦希尔德给他讲述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他不知道德国犹太人原来就是德国人，东欧的犹太人都是从德国迁移去的。他们说

一种古老的“高地德语”，而且几个世纪以来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与德国联系密切。1914年，德国皇帝的军队被当作解放之师而受到犹太人欢迎。世界各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对德国的语言和文化都很尊敬。他不了解纯种德国人是否欢迎犹太人进入他们的社会，也不了解犹太人的地位怎样。

后来，布伦希尔德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她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她所讲的只是在她小的时候，犹太人与德国人相处融洽。

在“纽伦堡法”颁布以后，希尔玛离开了寄宿学校。这个法令禁止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之间通婚和发生性行为，而且对非雅利安人进行了明确定义。显然，迟早“半犹太人”会被禁止上大学，而希尔玛想去学文学或音乐。

很快对被收养的“半犹太人”也颁布了法令。他们需要提供证据表明自己的亲生父母和祖父母是“雅利安人”。

在看到这个法令以前，弗诺·韦尔克曾写信给法兰克福的有关当局询问怎样对待这个孩子。她得到的答复是希尔玛不能上大学。希尔玛的血统不纯成了他成功的巨大障碍。

1936年4月1日，家里决定让他做个药剂师，并把他送到一家药店当学徒工。

1938年11月，希尔玛亲眼目睹的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犹太商人为了保护他的商店，把他获得的一战勋章挂在橱窗里，但纳粹党人还是砸了他的商店。

布伦希尔德出生在斯德丁的一个保守的普鲁士军人家庭，童年及青年时代日子都很艰难。她的父亲是一名保守的反纳粹主义者，一直深受一战给他留下的伤痛的折磨。战争期间他被炸弹击伤，后来不得不长期服用止痛药，情绪一直很低落。他的偶像是陆

军元帅奥古斯特·冯·麦克林。

此人在1914年成功地组织战役，击溃了沙皇的军队。当这位陆军元帅后来到斯德丁参加阅兵式的时候，布伦希尔德的父亲与其他一战老兵一样，非常激动。他们穿上一战期间的军服，并向元帅行军礼致意。

整个三十年代，布伦希尔德的父亲都在诅咒希特勒，并且预见到后来发生的灾难。在她18岁的时候，布伦希尔德离开家庭与朋友莎拉·弗朗克住到一起。她在莎拉·弗朗克家里住了三年半，并且学会了做生意，在书店当会计。1941年，她父亲的健康状况极度恶化，被送到附近的医院，最后成为纳粹党“安乐死计划”的牺牲品。

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还不是最早与布伦希尔德联系的亲戚。六十年代初期，克劳斯·迪耶特曾与美国一位同名的克劳斯·内特有过接触。当时克劳斯·内特在基尔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学习。德国的克劳斯·内特开了一家照相馆，而美国的克劳斯·内特是他的顾客。但德国的克劳斯对美国的克劳斯以及内特家族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只对现在而不是对过去有兴趣。

我们第二天下午去布伦希尔德家里碰到了克劳斯·迪耶特和他的妻子。夫妇俩对我们很客气，但寒喧之后就告辞了。

但六十年代的第一次接触与这次完全不同，美国的克劳斯后来成为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经济学家，并一直居住在那里。德国的克劳斯把他与美国克劳斯接触的情况告诉了他妹妹格德鲁恩。后来格德鲁恩费尽周折找到了美国克劳斯的地址并去见了他。格德鲁恩对自己的身世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她想尽可能地了解她父亲家族的历史，而且寻根在六十年代非常盛行。但格德鲁恩与美国克

劳斯的会面并不成功。美国克劳斯后来告诉我，他认为格德鲁恩追溯内特家族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求个人利益。

美国克劳斯的冷淡态度深深地伤害了格德鲁恩。很显然他们之间缺乏交流。

在了解了希尔玛的身世之后，格德鲁恩再也不愿意呆在德国。她告诉我，即使到了今天，她仍然不完全习惯生活在德国，她学了一点希伯来语，后来两次去过以色列。一次呆了三周，另一次呆了两周。1967 年，她报名参加以色列军队，但未获批准。她也曾在阿尔及利亚居住过。后来在葡萄牙与一位名叫梅勒·德·巴巴拉的人结了婚。在国外生活二十年之后，她与她收养的女儿一起回到德国居住在基尔附近。

希尔玛在 25 岁时死去。格德鲁恩 25 岁的时候，她也想到过死，因为她不愿意比希尔玛活得长。

但幸运的是，她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第六章

慕尼黑　1989年7月下旬

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德特住在慕尼黑的一家老人公寓里，离宁芬伯格城堡不远。虽然天气很热，但她还是邀请我去喝茶。我们约定下午四点在老人公寓的大门口见面，因为那里的门卫检查很严。

我比预定的时间提早了10分钟，远远就看见了她。我惊奇地发现她长得很像我父亲，当然，这也是我最希望的。我想，这可能会让她更容易相信事实的真相。我想了很多办法来跟她谈这些事，这需要拿破仑的智慧和塔利兰德的外交才能。奥德特不可能知道过去的事情。

像我父亲一样，奥德特长得不高，但五官端正，都有一双蓝灰色的眼睛，尤其是身材极为相似。同我们三个兄弟姐妹比起来，奥德特最像父亲。

前一天晚上她还想拒绝我的来访，但今天她看起来心情不错。她领我来到了她的房间。

一进门，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镶了框的家谱，是冯·莫克勒家族，一直可以追溯到11世纪。

奥德特家的客厅整洁而舒适，摆着名牌家俱，她给我倒了一杯

茶，并拿出一些小吃。

我打开箱子，拿出录音机。

“你得谅解我，”我一坐下了就说，“我是个记者和播音员，录下有趣的对话是我的职业习惯。你不介意我这样做吧？”

“不会的，”她让我把录音机放在桌上，然后问，“你是个播音员吗？”

“是的，我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当了35年的播音员。”

“你认识一个叫彼得·弗林克的人吗？”

碰巧我认识他。他是个有天赋的画家，与我差不多大，是蒙特利尔的一名电视剧布景师。

“太好了，”她说，“我们算是有了一个共同的朋友。你得代我问候他，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我们在柏林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那时候他是防空部队的一名中校，战争结束后他去了加拿大，只回过德国一次。”

“今天是星期一，”我说，“我明天返回多伦多，星期三我给他打电话。”

“太感谢您了。告诉他让他给我写封信。”

她坐下来。我打开录音机开关。

“不，现在不忙开始。”

我关掉机器。

“我先讲讲其他事情。我上一次接受采访是1983年我丈夫去世后。那时巴伐利亚一家电台的记者要作一个关于丧失配偶的老人如何生活的节目，因此采访了我。”

“那次采访一定让你感到痛苦。”

“也不一定。事实上，失去配偶也能生活。但4年后，也就是1987年当我儿子阿克塞尔死时，我完全对生活绝望了。”

她讲到这里时，言语有些哽噎。

“他是个天才记者，自杀前5个星期刚刚获了奖。儿子死后我就搬了家。现在我住在这儿感觉很舒适，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前天晚上你在电话里对我说，你要去参加什么会。”

“我是文化协会的理事。我们为当地对文化感兴趣的人安排讲座。有人称我们为精英分子，但我并不介意。自从你那晚给我提到在法兰克福一个叫科克的人后，我一直在想这件事。现在你可以开始了。”

我感到有点吃惊。

“科克是我母亲的金融顾问。”

路易斯叔叔?!

“你还记得当你还是个小孩子时，你母亲带你到法兰克福科克的珠宝店见过他吗?”

“很有可能见过的。”

我给她描述了路易斯叔叔的样子。“由于家庭的原因，”我解释道，“你极可能见过他的。”讲到这里，我有些犹豫了。我接着说：“你的母亲和……”

我本来想说“和科克家族的某个成员有联系”。我已经快要说出事情的真相了。

“有人说，”奥德特打断我话，不让我有机会。“我父亲给我留下一些财产，但我并不知道这些钱在哪儿。即使我拿到这笔钱，在通货膨胀时期也会贬值的。”

我的堂兄告诉我，路易斯叔叔认为他对她们母女俩应该负有责任。他后来也是这样做的。通货膨胀时期，母女俩不得不变卖家族的一些珠宝，路易斯叔叔帮她们联系买主，自己也买了一些。这些奥德特都记得很清楚。但后来，奥德特的母亲变得有点讨厌了，路易斯叔叔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整整一个小时奥德特不知疲倦地讲述她的故事，让我没有机

会插嘴。我原来设想的我们见面的场景是：我对她说，奥德特，让我告诉你吧，我们是姐弟！然后我们拥抱，哭泣，就像《纽约人》报上所描述的那对母女见面的情景一样。

‘我想，明年夏天我再来告诉她吧。

奥德特送我到门口。

“不要忘记给彼得·弗林克打电话。”

“好的。”

“你会给我写信吗？”

“不仅是写信，”我说，“明年夏天我会再来看你。我有个女儿也住在慕尼黑，我每年都要来。”

“我等着那一天。”

星期三，我给彼得·弗林克打了电话。

“你见到奥德特了吗？”他惊叫道，“她还好吧？”

我告诉他奥德特的情况。

“我会立即给她写信的。”

“下次我到了多伦多，我们一定要一起吃顿饭。”我说，“我想听你谈谈奥德特的情况。”

三星期后我们见了面。彼得告诉我战争期间他在柏林驻扎时与她的交往以及战后的生活。我告诉他为什么我要去见奥德特。

我问，“你觉得她是否有所察觉？”

“如果她察觉了，她一定会给你讲，”他仔细想了一会儿说，“她是个直言快语的人。”

九月底我收到了彼得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告诉我过去的经历。他感谢我帮他与奥德特重新建立了联系。生活是多么奇妙啊……

两周之后，我得到奥德特的死讯。

这就是生活。

第七章

请告诉我你父亲的血统

在1933年，有百分之四十的犹太人与外族人通婚。到1934年，这个数字下降到百分之十五。

杰里米·诺克斯：《纳粹对“半犹太人”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1939年3月，战争爆发前6个月，希尔玛通过了药剂师资格的最后一次考试。霍斯特16岁了，已经辍了学。他打算自己去开创一种新生活，但每个工作都干不了几天。他干得最长的工作是在一艘船上干了两个星期——因为当时船航行在公海上，他无处可逃。

青年委员会的官员找到了弗诺·韦尔克，并对她说，“如果你管不了你的孩子，我们只好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了。”

弗诺·韦尔克惊慌失措。她最宠爱的霍斯特将被带走。

“你们在说什么？”

官员向她作了解释。

“这个是天大的误会！”她叫道，“你们把名字搞错了！那个讨厌

的孩子是希尔玛，不是霍斯特！”

官员向她致歉，马上传讯了希尔玛。希尔玛告诉官员，他正在考试，并让他们向老板了解情况。

然后他回家与养母吵了一架，就搬出去住了。

那时弗诺·韦尔克在纳粹党里还有点势力。她跑到当地的党部去告发希尔玛。

“那个叫希尔玛的孩子粗鲁无礼，他肯定是个犹太人。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下。”

两天后希尔玛就搬回来了。他通常很快就原谅她了。

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希尔玛主动报名参加德国军队。他希望他这样做能改变他的形象，但军队方面认为他不适合服役。

当布伦希尔德给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她猜测由于弗诺·韦尔克的告发，纳粹党一定干预了希尔玛的参军申请，这也许是希尔玛的申请被拒绝的原因。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德国军方不可能听命于纳粹党。更重的是，纳粹党没有必要干预这种小事，希尔玛被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无法证明他的父亲是雅利安人。

1935年后，犹太人被禁止在军队服役，但“半犹太人”则不受这种限制。如果希尔玛能够证明他的父亲是雅利安人，他就能参加德国军队。但他没有足够的证据，因此军方把他当作“半犹太人”。1940年4月8日，德国政府颁布命令，正式禁止“半犹太人”参军。但那时，德国军方正忙于西线的战事，无暇清退军队中的“半犹太人”。在这以后，希特勒对“半犹太人”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例如，有时对那些很难认定的“半犹太人”，政府的政策又比较宽容：

那些最难认定的“半犹太人”是那些私生子，他们从未见过亲生的犹太人父亲或母亲，而且一直由父亲或母亲一方抚养长大。根

据现存的零星资料，希特勒认为“半犹太人”的标准包括外貌特征，对纳粹党的贡献，以及在战争中的表现。

希尔玛的血统认定似乎很简单，他只要找到与他处境相似的人，这些人会告诉他该找哪些人帮忙解决这种问题。但不幸的是，希尔玛当时找不到任何能与他商量这件事的朋友。

我给国会图书馆写过两次信，但他们的档案中没有记载希尔玛的情况，他们能够做的是给我寄来了相关的法规。

战争爆发后的第五个月，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出斯德丁，两年后纳粹实行了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

1940 年 2 月 16 日，美国驻德国大使给美国政府发回了如下电文：

从可靠渠道得知，斯德丁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得到命令，限定他们在 1 月 12 日（星期一）之前必须离开他们的家。后来，这些人马上被送离斯德丁，然后警察查封了他们的房屋，只有小孩和生病的老人幸免于难。他们分别被送进儿童院和老人院，现在还不清楚这些犹太人到底被送到什么地方，但据说他们最后会被送到波兰东部的卢布林。

为什么希尔玛没有在被驱逐的犹太人之列？为什么他后来也没有被送到东部？为什么直到 1944 年 1 月 11 日之前，他仍然拥有个人自由，为什么盖世太保和纳粹党人在这期间都没有迫害他？

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不属于任何政府认定的危险组织。

而更好的解释则是：他仅仅是暂时运气很好罢了。

即便是弗诺·韦尔克向纳粹党的人种政治办公室举报了希尔玛，希尔玛还是躲过了劫难。布伦希尔德给我们看了一封人种政治办公室写给弗诺·韦尔克的信：

亲爱的弗诺·佩弗先生（弗诺·韦尔克一直用她丈夫的名字）：

很不巧6月6日我们没有在办公室会面……请您给我打电话，我们好另外约个时间……

我们肯定会对这事采取行动的。

很显然，信中所指的“采取行动”，肯定是对希尔玛不利的。

希尔玛生于瑞士，因此他到瑞士领事馆去申请护照，但遭到拒绝。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因这些事而与纳粹当局产生磨擦。后来，他又向瑞典领事馆寻求帮助，因为布伦希尔德有很多朋友和亲戚在那里。但是也以失败告终。

1941年2月14日，警察局给希尔玛寄了一封挂号信：

为了证实你是否是一个犹太人或“半犹太人”，你需要在4月1日前提供以下证明：

1. 你本人的出生证明；

2. 你母亲的出生证明；

3. 你祖父母的出生证明或洗礼证明；

4. 他们的结婚证明。

既然你是个私生子，你必须向你的监护法庭提供一份文件——写出你亲生父亲的名字。而且，你应提供第2和第4款规定的你亲生父亲的相关文件。

如果你不能提供这些文件，我建议你提供一份由帝国家谱研究所提供的报告。

如果你不按上述要求办，你就会被认定为犹太人。

希尔玛一收到信就立即去家谱研究所咨询。这家研究所的前身是纳粹党信息办公室。1934年并入纳粹帝国内政部，成为裁定血统案件的权威机构。其他机构，如警察局，可以询问某人是否为

“半犹太人”或“四分之一犹太人”，如果得到不实回答，将受到惩罚。但只有研究所可以根据所谓的“祖先研究报告”或婚姻登记报告作出最后裁决。研究所主任叫阿基·格尔克，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人种目录。

研究所的官员对希尔玛的态度还比较友好。他一定对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并提供了出生证，上面有他的原名：罗伯特·内特，出生地，他母亲及祖母的名字和出生地。根据这些资料，他们会很快发现希尔玛是真正的犹太人。

但他们无法证明他的父亲是否为“雅利安人”。

第八章

赫林根，威斯巴登，法兰克福，柏林

与其说魏玛共和国时代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不如说它仅仅是俾斯麦帝国的延续。它只是这两个政权之间的一个过渡。它的失败证明了德国几百年的历史最终是为了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所利用的观点——大德国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强人政治和反犹主义在他上台以前就早已深入人心。但仅有观点还远远不够，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如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像希特勒这种独一无二的人……这种政权的空白导致了俾斯麦的独裁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没有希特勒，还是会有其他人出现，只不过建立的不是纳粹德国。但恰恰这时出现了希特勒，他掌握了政权，并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

戈罗·曼：《1789年后的德国》

男爵莫里兹·冯·莫克勒1918年6月在西线的战斗中丧生，奥德特当时与母亲住在奥伯林根城堡里。男爵莫里兹死后不久，奥

德特收到一个装有他遗物的包裹。战争结束后，她来到法国寻找莫里兹的墓。她找了很长一段时间，找到时发现墓碑上的名字都拼写错了。

1839年，伍腾堡的国王把奥伯林根城堡借给冯·莫克勒一家使用，但国王保留对城堡的所有权。国王被废黜后，魏玛共和国接管了城堡的产权，而且规定只有冯·莫克勒家族的男性成员才能继续住在城堡。但这个规定在1918年6月以后就不存在了。莫克勒家族的另一个分支——土耳其分支，他的族长米亚·冯·莫克勒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一名成员。是他导致我去见了奥德特。

离开这座交通不便、与世隔绝的城堡，冯·莫克勒家族的成员们感到很高兴。男爵莫里兹死后留下遗嘱要求把他的财产分给妻子和土耳其分支的成员。这并不是法律的规定而只是他个人的意愿。

很显然，当时莫里兹夫人向路易斯叔叔进行了咨询。路易斯叔叔帮她请了一名律师处理遗产分配事宜。最后的遗产分配结果对莫里兹男爵夫人非常有利。

1912年，男爵夫人与奥德特搬到埃德谢姆的一座别墅，在美因河的右岸。这座别墅有22间房子，是由一个著名的工程师建造的，周围是一派田园风光。当时男爵夫人的贵重物品整整装了15辆马车。

在经济萧条期间，她不得不变卖一些金银首饰。显然，她不能只靠丈夫的抚恤金来维持生活，但她善于经营。她想方设法把奥德特送进了一所女子学校。学校位于威斯巴登，收费异常昂贵，很少有德国人能够负担得起。

奥德特在这所学校前后共呆了七年。学校的学生以法国人为主，还有俄国的公主以及其他国家的贵族子女。学校的老师非常强

调学生讲一口纯正的高地德语。

1929年，奥德特从学校毕业后，男爵夫人与她就搬到了法兰克福西区，与我们当时所住的地方只相隔几个街区。从此奥德特告别了乡村，进入城市。在法兰克福这座城市，无论多么巧的事情都会发生。我想，那时我为什么没有碰见过她？如果我们相遇，也许我们会相爱。

男爵夫人和女儿刚搬到法兰克福不久就碰上了经济大萧条和纳粹执政。男爵夫人搬到法兰克福是为了给女儿创造最好的条件让她进入上流社会。奥德特也具备这些条件：她相貌出众、举止优雅，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在那些年代，上等人家的女孩很少进大学，而奥德特进了一所著名的商学院学习文秘。即使她找不到合适的丈夫，她也会自己谋生。

但奥德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丈夫，虽然有很多人邀请她参加舞会。其中也有几个犹太人，不久就离开了德国。

1933年，新的纳粹党执政德国，男爵夫人是怎样看待这届政府的呢？也许她和许多德国上流人士一样，对希特勒这个出身卑微的人取得如此地位感到震惊，但他们并不反对希特勒政府，因为他结束了“凡尔赛条约”给德国人带来的耻辱，并抑制住了“共产主义”的蔓延。而且希特勒上台之后政局稳定，不像以前的德国，一年换三届政府。几乎在一夜之间，失业现象消失了，人们脸上又重新露出了笑容。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与德国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另一种可能是男爵夫人同她的朋友厄恩斯特·尤迪特一样，认清了纳粹的本质。尤迪特在奥德特一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尤迪特才18岁。在战争期间，他一共击落了22架盟军的飞机，因此他获得了最高荣誉勋章。

20年代尤迪特做过试飞员，特技飞行员，经营过航空公司，并周游了世界。1932年，美国总统胡佛在白宫接见了他。

1933年1月29日，尤迪特参加了每年举行一次的柏林舞会。与他同行的还有剧作家卡尔·朱克梅尔。剧作家后来流亡到美国，以尤迪特的事迹写了一部著名话剧，名叫《魔鬼将军》。

他这样写道：

在舞会上有人说希特勒已被任命为总理。听到这个消息，有些人表示怀疑，有些人热情支持，但大多数人反应冷淡。

舞会结束后我们与尤迪特一起来到我母亲家中。他悄悄对我说：“不要再提希特勒了。这样会破坏你母亲的好心情。”

希特勒上台后，戈林到处拉拢他的老战友，即使是持有反纳粹观点的人。他需要利用他们的力量来组建德国空军部队，而这正是“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

1933年2月，尤迪特拒绝了戈林的要求。他告诉戈林，他只是喜欢飞行，而不愿穿上军装，并卷入政治。

6月，他去了美国，并接受了《圣·路易斯报》的采访。记者问过他对希特勒的看法。从内心来说，他很讨厌希特勒，但他是个爱国者，他不愿在国外诋毁自己的政府。他说，许多美国报纸都喜欢夸大其辞，希特勒的所作所为都符合4千万德国人的愿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帝王统治时代已经结束了。有些犹太人确实受到处罚，但不要因此产生误会。任何一个德国犹太人，只要他遵纪守法，不参加共产党，就不必担心受到侵犯。只有那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才会受到严惩。

1935年4月，尤迪特参加了戈林与他第二任妻子的结婚典礼。有224名来宾出席了婚礼。尤迪特与高列特·朱利叶斯坐在

一桌，此人是一家著名的反犹太周刊杂志社的编辑。尤迪特后来说，我只好把自己灌醉才熬过了那个晚上。

但尤迪特对飞机的喜爱超过了他对纳粹政府的憎恨。不久他担任了航空部技术室主任，很快被提升为军需局局长。

1936年11月，尤迪特想到巴黎去参观航空展，但德国政府已公开拒绝参展，他只好以半官方的身份去。在巴黎他被邀请去参加一次聚会。德国大使让他穿军装去。“天哪！”尤迪特叫道，“如果我穿上德国军装坐出租车去，而司机又恰好是个犹太人，他一定会对我吐唾沫！我还是穿燕尾服去好。”

后来他回到柏林见到了剧作家朱克梅尔，作家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他对我说：“这次就不到霍克饭店——我们常常聚会的地方——去了。那里到处都是德国高级军官。”因此，我们改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

他身着便装，但那时他已是德国空军的高级官员了。“远远地离开这个国家吧，”他对我说，“而且永远不要再回来。这个国家已经不可救药了。”

“那你怎么办呢？”我问。

“我已把一切都献给飞行事业了，我无法放弃。但总有一天魔鬼会把我们都带走。”

后来，戈林把对英国空袭失败的责任都归咎于尤迪特，而且他也一直怀疑自己缺乏组织能力。他的痛苦与日俱增。终于在1941年11月17日，他自杀了。

希特勒参加了国葬。

戈林致悼词。

尤迪特与奥德特在30年代早期相识。

他们相互爱慕。

“他们是认真的吗?”在奥德特死后,我问米亚·冯·莫克勒。“奥德特是不是希望嫁给他?”

“噢,”冯·莫克勒笑道,“我想他们是认真的。奥德特曾告诉过我,1936年两人一起去了柏林。那时候谁都没想过会爆发战争。尤迪特是她母亲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喝茶。奥德特请求尤迪特带她离开法兰克福。后来奥德特就成了他办公室的秘书。在工作期间,她结识了汉斯·埃伦斯,她后来的丈夫。尤迪特非常生气,他觉得奥德特拒绝了他。”

第九章

恐　惧

纳粹党宣扬一种观点，必须把犹太人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驱逐出去，即使是“半犹太人”。这就意味着犹太人不能与德国人或其他血统的人通婚。因此大多数德国人认为，必须把犹太人与“半犹太人”同样对待——都把他们在短时间内驱逐出德国。

1942 年 1 月 20 日

《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最后决议》

1941 年，希尔玛与布伦希尔德在一家咖啡店相遇了，当时正是首批犹太人共 1200 人被驱逐到波兰 13 个月后。他们是经朋友介绍的。希尔玛那时在一家理发店上班，布伦希尔德是一家书店的会计，两人年龄相同。

在 1941 年的德国，如果一个看上去健康的年青小伙子没有参军，可能有 3 个原因：一是体检未过关；二是在为军队做秘密工作；三是因为他是“非雅利安人”。

他们相识 6 个星期后，布伦希尔德得知，希尔玛无法证实自己

的“雅利安血统”。他告诉她，自己是被收养的，他的亲身母亲是个犹太人。他没有告诉她更多的情况，她也没问。

1941年，纳粹党正处于顶峰时期。6月22日，他们发动了对苏联的战争，并且进展顺利。直到10月份攻打莫斯科才受到阻碍。把美国卷入战争的珍珠港事件也还没有爆发，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也还没有吃过败仗。希尔玛和布伦希尔德周围的人都认为德国会赢得这场战争。即使德国政府经常性地驱逐犹太人，但由于希特勒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德国人支持纳粹政体，至少不会反对。希特勒的支持率只是在他吃了很多败仗后才开始下降，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德国最终会取得胜利。布伦希尔德告诉我，1944年，她的一位朋友想把房子租给一名德国军官。这位军官很崇拜希特勒，但他亲眼目睹了德国军队从苏联战场撤退时残杀犹太人和苏联战俘。“等我们打完了仗，”军官说，“我会向这些人民忏悔。”

1941年春天，希尔玛和布伦希尔德都希望德国失败，但不敢公开表露。即使希尔玛能证明他的父亲是“雅利安人”，他也只是个一等“半犹太人”，因此，他与布伦希尔德的婚姻——或发生性关系——都是非法的。

1942年1月20日，在万斯康费尔斯会议上决定了如何处置欧洲犹太人以后，纳粹党又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如何处置“半犹太人”。

“半犹太人”的问题不是很重要。如果1100万犹太人被处决掉，那么在德国的7万“半犹太人”只占其中的百分之零点五。这次会议的纪要总共有15页，其中有5页都是关于这个问题。1946年纽伦堡审判时被作为罪证。

在恋爱问题上，“纽伦堡法”规定了一项新罪名——破坏种族纯洁罪。如果有人告发布伦希尔德，那么她会被判长期监禁；而希尔玛会被流放。毫无疑问，他们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

1941年4月，弗诺·韦尔克被判伪造罪。她在医院当临时护士时，把病人处方上麻醉药品的剂量从5改到10，这样她就把多余的药品都给自己注射。这种办法很有效，但她此后就上瘾了。后来她自己生了病，医生检查出她曾服用过大量毒品，骗术因此被揭穿。她被送上法庭并判6个月监禁。出狱后被送到德国东南部一家精神病院戒毒。

1983年夏天，格德鲁恩和我都在想法寻找关于韦诺·韦尔克在疯人院期间的笔录。后来找到了它：

她情绪激动，不回答问题。一直不停地做针线活，不理医生、护士。大腿上到处都是注射留下的疤痕。否认篡改病历。她说，服用毒品是由于无法忍受肾痛……

弗诺·韦尔克不光情绪激动，还经常与医生、护士吵架，后来被送去强制劳动。希尔玛想尽办法把她送回疯人院里。他还两次带布伦希尔德去看她。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告诉他们，弗诺·韦尔克曾写信告发过希尔玛不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是一个被收养的“半犹太人”。

希尔玛和布伦希尔德只能寄希望于有关当局不把这封信当真。他们虽然认识一些与他们相同遭遇的人，但没有人给他们积极的建议。布伦希尔德想起一个叫厄利·吉纲恩的人，他的母亲是个犹太人，也被宣布“不适合留在军队”。那次她在街上碰到他，想跟他说话，但他说“不，我们最好不要交谈”。然后就走开了。他们还认识一个叫冈特·克诺夫的人，有四分之三的犹太血统。他也没有参军，并被逮捕过几次。除此之外，他们与犹太社区没有任何联系

了。

在布伦希尔德最困难的时候给她巨大帮助的是她书店的一名同事。有一次他被盖世太保抓住，并被关了几个月。布伦希尔德说起他时充满了感激之情。

他们相识不久，希尔玛就告诉布伦希尔德他们应该断交，如果继续下去会给她带来危险，这是对她不负责任的。布伦希尔德拒绝了。“这件事由我自己决定。即使我们将来分了手，我们也要以一种庄重的方式。”

1942年6月初，希尔玛邀请布伦希尔德来到一家餐馆。她注意到希尔玛的表情很严肃。希尔玛告诉她，他已经做出决定，分手的时刻到了。

餐馆里的乐手感觉到两人间的紧张气氛。他来到桌旁问他们是否想点一首歌。

她说：“就唱《亲爱的，我们怎么啦》这首歌吧。”

乐队开始演奏。希尔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冲出了餐馆。

等希尔玛回来时，他低声对她说：“亲爱的，你让我真不知该怎么办。”

“那就好。”她坚定地回答。

7月7日，他们定了婚。

9个月后，1943年3月28日，他们的儿子出世了。

第十章

汉斯·埃伦斯

最先让人了解的是一个人的性格。和一个所谓的坏人相处久了，你会发现他的优点越来越多；而和一个所谓的好人相处久了，你会发现他的缺点越来越多。

乔治·克里斯多夫·利希腾伯格

1939年1月19日，奥德特与汉斯·埃伦斯结了婚，他们是在厄恩斯特·尤迪特的办公室相识的。

我不知道尤迪特是否参加了婚礼，但我知道汉斯·亨克尔是证婚人。作为戈培尔宣传部的一名官员，他的任务是清除犹太人在德国的文化领域中的影响，并负责监督犹太人的文化生活。

汉斯·埃伦斯是个38岁的自由撰稿人、编辑、出版商，并有个8岁的女儿，这是前妻给他留下的。奥德特与他结婚四十四年，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1982年他因病去世。

1937年，在汉斯·埃伦斯的一份履历中写道：

我1901年4月18日出生于施瓦本斯德特，在梅尔多夫读小

学。1916年——1918年，我在汉堡赫罗尔德书店当过学徒，售货员。后来我先后在赫米斯和康拉德出版社任职，从最基层学习出版业务。几个月后，我去了布雷门的洛克书店。我经营过两家书店，擅长宣传策划工作。我对文学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并出版过很多著作。

他的履历列举了许多关于他在图书经营中的活动，并特别强调曾担任过出版社的广告部经理。1931年在科隆他开始经营自己的书店，但由于一些私人原因，1932年他又关门了。直到1934年5月他才重新工作，成为柏林乌尔斯坦公司宣传部部长。在履历的结尾他写道：本人信奉路德教，是雅利安人。

在他与奥德特相识时，他靠写作勉强维持生活。他写过广播剧，有时也给纳粹的权威报纸和杂志写文章。他对飞行有特殊的兴趣——正因为如此才把他与厄恩斯特·尤迪特联系起来。他和许多严肃派作家都是朋友。直到1937年他才加入纳粹党。

婚礼的证婚人汉斯·亨克尔，早在1921年就加入了纳粹党。因此他是纳粹党的元老了，比戈培尔还早四年。

虽然汉斯·埃伦斯有个有权有势的朋友，但他还是需要一个漂亮能干的妻子帮他应付一些事情。

1932年，在纳粹党上台执政前夕，他出版了一本关于著名犹太作家茨威格的书，可能这就是他在履历中提到的关闭书店的“私人原因”。这件事使他不得不在纳粹文化界小心从事，以免被人揭发出来。

汉斯·亨克尔绝对知道这件事，但他把这件事看得并不严重，只当是汉斯·埃伦斯的幼稚行为。但也可能亨克尔把这件事当作汉斯·埃伦斯的一个把柄，有了机会就可以此相要挟。（1944年9

月，他的确这样做了。）总的来说，亨克尔认为汉斯·埃伦斯是他可以利用的人，除此之外，他们两人也互相欣赏。

汉斯·亨克尔对犹太人的看法很独特。一方面，他认为犹太人都是害虫和撒谎大王；另一方面他又钦佩德国犹太社区的活力和个别犹太有识之士。在二战期间，亨克尔与一个在集中营关过的女人结了婚。戈培尔对他并不完全信任。在戈培尔的日记里，他曾这样评价过亨克尔：“他是个天生的叛徒和撒谎者。”

不管戈培尔怎样看他，整个三十年代，他都兢兢业业地为纳粹卖命，在文化领域内“解决犹太人问题”，即阻止犹太人、“半犹太人”及犹太人的亲戚参加公共活动，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犹太社区内。

汉斯·埃伦斯与茨威格1920年在布雷门的一次作品讨论会上相识。埃伦斯这样写道：

多么难忘的两个小时啊！我那时只有19岁，而且对这位作家充满了敬仰之情。他所有的作品我全都读过。他的有些诗我还能背诵。当时他刚出版了一本新书，扉页上还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汉斯·埃伦斯。

茨威格一定被这个聪明而有吸引力的年轻人打动了。他们在希尔曼斯旅馆里单独谈了两个小时。“这简直是天堂一样的生活，”埃伦斯写道。第二年，茨威格邀请他到离他家不远的旅馆住了一个星期。晚上他们就到咖啡馆谈心。他们还一起去拜访了卡尔·朱克梅尔，《魔鬼将军》一书的作者。

1931年夏天，茨威格邀请汉斯·埃伦斯与他同去巴黎，巴黎汉斯还不曾去过。白天茨威格工作，他就上街游览，夜晚他们一起

度过。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33年夏天。

纳粹党上台后犹太人的处境越来越严峻，茨威格不得不离开德国，从此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汉斯·埃伦斯不时收到茨威格寄来的明信片，最后一次是1935年。在瑞典度假时，埃伦斯给茨威格写过一封信，他回信说，要警惕德国的纳粹势力。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

1932年，汉斯·埃伦斯出版了第一本关于茨威格的书。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2月，埃伦斯在一个学术组织的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题目叫《论青年的解放》。在演讲中，他谈到近几年青年人所经历的痛苦和绝望。

他这样讲道：

给我们一点时间！耐心一点！我们已经遭受了千百次打击，现在形势才开始好转。痛苦的昨天已经过去，我们正在走向自由、幸福的明天……

我们必须考虑到子孙后代，不能在困难面前退缩。我们要为他们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德国，不能让他们以后嘲笑我们是软弱无能的一代！

我们年轻人必须为德国的生存而战。每个年轻人都应该以施拉格特为榜样。他短暂的生命应验了诗人海因里希斯·勒奇的名言：我们愿为德国献出一切。

1933年6月27日，汉斯·埃伦斯把这篇演讲稿随信寄给汉

斯·亨克尔，并附上了履历。在信中他写道：由于运气不好，自己已失业两年。如果亨克尔觉得他能够胜任，他愿意为他效劳。

亨克尔立即回信表示他很欣赏这篇演讲稿，并愿意刊登。埃伦斯非常激动。6月3日他给亨克尔回信说另一家杂志也要刊登这篇文章，不知亨克尔是否愿意作序？同时他还问到有无工作的机会，并附上自己的作品目录，其中根据韦格尔的小说改编的剧本正在拍摄之中。

戈培尔对这部电影很感兴趣。他认为这部电影将会引起轰动，拍摄完毕之后，可作为献给元首希特勒的礼物。

亨克尔回信表示愿为他作序，并寄上自己近期写的文章《革命的精神》，告诉他可以选取自己认为合适的部分。埃伦斯就选取了如下段落：

在德国两千年的历史中，由于外来文化的渗入影响了它的纯正，真正的德国精神被压抑了。但德国精神仍然强大而有活力。新的政体的创建将使我们有机会见到德国精神的重建。

6月25日，埃伦斯又给亨克尔写了一封信。

我是否能在剧团或广播电台找到工作？我在出版界工作了15年，经验丰富，与文学艺术界很熟悉。我完全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如果给我一份工作，我会把它干得很好。如果您能让我为新帝国工作，我将不胜感激。

亨克尔没有给他找到工作，也没能为他的电影寻求到赞助。两年后，即1935年9月11日，他再次写信给亨克尔：

我寄给你一本书《德国森林》，我想你一定喜欢。我们能否有机会单独谈谈？

后来，亨克尔与埃伦斯的关系逐渐密切，以至于他们在信中的称呼都改变了。

四五月份，埃伦斯有意出版亨克尔的著作，内容是如何消除犹太人在德国文化中的影响。他给亨克尔推荐了一本研究东欧犹太人的学术著作。5月5日他给亨克尔写了一封信：

在圣诞前你提到的那几张犹太人的照片还在不在？如果你有时间，我想来拜访你。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攻陷了波兰。这天，埃伦斯给亨克尔写道：

虽然我知道会给您增添不少麻烦，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在电影厂制片人面前说句好话。我想您一定认识他。

我听说这个制片人正在招兵买马。我对宣传策划和剧本写作很感兴趣。我曾找过许多工作，但都未成功……我的运气真是不好。在9月15日以前，我必须找到工作，否则我无法度日。

就在埃伦斯穷困潦倒的时候，奥德特改变了他的命运。

对凯蒂·赖克未有所保留，没有告诉她实情。假如1913年冬天和

第十一章

探寻与研究

他到底得到了什么?他被引进一间办公室,但其中的装饰与陈设又不像是办公室。他与科兰姆说话,但对方又好像不是科兰姆。

卡夫卡:《城堡》

在汉斯·埃伦斯与希尔玛的经历中,都有一个污点。汉斯·埃伦斯只要能够掩盖那个污点,他就能成功发达。而希尔玛的命运却取决于他是否能抹掉那个污点。如果他能够向警方证明他只是一个"半犹太人",而不是一个犹太人,他就不会被驱逐到波兰。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半犹太人"才开始被驱逐出境。

但谁能证明他的出身呢?他手中仅有韦尔克与凯蒂·赖克夫的通信和他自己的出生证。

希尔玛猜想他一岁前的生活是在斯特拉斯堡度过的,因为他是在凯尔被交给保姆的。而凯尔是莱茵河边的一个德国城市,与斯特拉斯堡隔河相望。

当年发生的事情只有他的祖母安娜·内特可能了解,也许她

对凯蒂·赖克夫有所保留，没有告诉她实情。假如1919年发生在苏黎士旅馆里的不是一桩强奸案，希尔玛怀疑那是一段一夜情。而且所谓的强奸只不过是内特一家为挽回脸面而编造的故事。当然凯蒂·赖克夫也极力帮忙遮掩此事。毕竟在那个时代，人们会同情一个遭到强奸的女子，而对一个发生婚外情并产下私生子的女子，人们只会对她投去鄙夷的目光。因为依照当时的道德观念，只有自甘堕落的女子才会有私生子。

1940年5月底，希尔玛写信给法兰克福警察局长，向他询问安娜·内特的下落。在信中，他说由于处理一些家事需要与安娜·内特立即取得联系。警察局长后来回信说安娜·内特已于1936年1月18日离开法兰克福去了苏黎士。

7月6日希尔玛写信给苏黎士的警察局长。警方的答复是：安娜·内特于1937年5月18日离开苏黎士去了巴黎，在巴黎的地址不详。虽然当时德国军队刚攻陷巴黎不久，但希尔玛认为在巴黎不大可能找到安娜·内特。

实际上，1940年安娜·内特已经不在巴黎，而居住在日内瓦。她在日内瓦一直住了十年，直到1950年3月25日死去。我一直在设想如果希尔玛当年找到了安娜·内特会发生什么事情。安娜·内特是一个严厉的女人，刚刚经受了丧子之痛。而且她一直在设法遮掩希尔玛的出身，可以想象一开始她肯定不愿意与希尔玛接触。但是我想即使安娜·内特了解了希尔玛当时的处境，她也不会提供什么帮助。

但如果他们之间愿意接触，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吗？如果希尔玛持有德国护照，他会冒着被严厉盘问的危险穿越边境吗？而且安娜·内特肯定不会越过德国—瑞士边境去迎接他。我想他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信件、电报，最多是通通电话而已。

两年过去了，1942年6月7日，希尔玛与布伦希尔德订婚。他们此前曾几次试图分手，但每次都重归于好。订婚以后，布伦希尔德在旁人面前提起希尔玛，都以“我的未婚夫”相称、虽然她清楚没有雅利安人血统的出生证明，希尔玛是不能与她结婚的。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去度了“蜜月”，以纪念他们的订婚。他们首先去了柏林，在那里他们访问了家系及血统研究中心。后来他们又到斯特拉斯堡去追溯家族的历史。他们进行这些探访活动的时候，不得不异常地小心谨慎，因为探究有关犹太人的历史在当时是很危险的。

但那次探访一无所获。六月份，他们来到法兰克福的种族研究所。他们知道这个机构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希望能找到某个了解内情的人。在种族研究所的原址内，住着一位妇女，但她对种族研究所一无所知。

我忘了问布伦希尔德他们去法兰克福时是否去找过凯蒂·赖克夫。毕竟，她也许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而且她肯定也非常乐意见到希尔玛，因为主要是她来处理希尔玛的收养事宜的。但是，即使是布伦希尔德和希尔玛找到凯蒂·赖克夫的住处，他们也会失望地得知她就在几天前为避免被驱逐而自杀身亡了。

第十二章

沙　龙

食品配给制度在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引发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例如，由于深海捕鱼船经常遭到水雷的攻击，一般的海产品要么很难在市场上买到，要么限量供应，但是诸如龙虾和牡蛎之类的贝类直到1944年盟军登陆之前却一直供应充足。同样，虽然很难在德国买到质量上乘的啤酒，但是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却到处都有出售。

玛莉·维斯科夫：《柏林日记，1940—1945》

从1939年10月10日到1940年3月6日，汉斯·埃伦斯一直都在西线战场上服役。据我所知，直到1943年3月，他才重新又穿上军装，这次他参加了空军少将阿道夫·格兰德指挥的战斗机部队。同时，他又是部队的书籍供应商。从1943年开始，他又开了自己的出版社。由于他与军方高层人士关系密切，大多数时候他都在自己家里工作，而不必参加作战行动。他与奥德特的寓所位于兰德格拉斯3号。

在战争的头几年，奥德特充分施展她的社交手腕，结交了不少

权贵人物，为她丈夫的事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些都是她的朋友彼得·弗林奇与我在蒙特利尔共进午餐时告诉我的。

1940年彼得·弗林奇在柏林的防空炮兵部队服役。1938年高中毕业后，他本打算学习建筑，但后来战争爆发，他不得不参加德国军队。在盟国大规模的空袭开始之前，防空炮兵部队很轻闲，因此彼得·弗林奇有机会经常参加奥德特举办的聚会。当然一有空袭警报，他还是得回到他的防空哨位。

彼得·弗林奇后来向我回忆道：“参加聚会的人都是纳粹德国的精英人物，包括作家、出版家、艺术家、著名影星、政府高级官员等。”

“你是怎样认识奥德特的？”我问他。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带我去参加她的聚会。在聚会上，奥德特向每位来宾都赠送了小礼物，我和她一起写礼物上的赠言。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她对客人照顾得非常周到，人长得不是特别漂亮，但是很有魅力。她是整个聚会的中心人物。”

“通常有多少人参加聚会？”

“人数不定，不过大多在30人左右。瑞士和瑞典的外交官在聚会上最受欢迎，因为他们能搞到美国爵士乐唱片和英国香烟。”

当时虽然已经实行食物配给制度，但奥德特的聚会上还是准备有充足的龙虾、牡砺和法国香槟。参加聚会的客人经常谈论德国当时发生的一些大事件，并喜欢开玩笑。玛莉·维斯科夫当时在外交部作秘书，也经常参加奥德特举办的聚会。在她的日记中她记下了聚会的客人就希特勒的助手之一鲁道夫·赫斯叛逃到英国一事而讲的笑话。（鲁道夫·赫斯是在1941年5月出逃的，官方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他精神失常了。）

5月18日，星期日，素以幽默著称的柏林人已经就赫斯的叛

逃编了很多笑话，例如：

“BBC 最新消息：星期日晚上没有发现其他的德国内阁部长叛逃。”

“德国最高统帅部公报：戈林和戈培尔还是被牢牢地控制在德国人手中。”

“很久以来大家都清楚，我们的政府发疯了。但现在政府居然自己承认这一点，这倒是一件新鲜事。”

“丘吉尔问赫斯：‘你就是那个疯子？’——‘不，我仅是他的助手。’”

让我们再回到彼得·弗林奇的回忆：

“对奥德特的丈夫我从来都没有多大的兴趣。我总觉得他长得像一只狐狸。但我知道他是一个有造诣的哲学家。他的朋友汉斯·亨克尔有权有势，经常帮助他。亨克尔每次聚会都会来，你一定听说过他，我认为他是个很讨厌的人，而且与戈培尔关系非常亲近。每次聚会他都要带一位漂亮的女演员同行，听说有一次他与戈培尔因争风吃醋而愤然离开。”

“你在聚会上碰到过戈培尔吗？”

“没有。但我见到过奥德特的母亲。”

“你对她还有印象吗？”

“我记得非常清楚，她长得很像玛丽女王。”

“能讲得更详细一点吗？”

“她经常都打扮得高贵、典雅，喜欢穿高领衣服。”

“你和她讲过话吗？”

“没有，我们都只和她打打招呼而已。她很少说话，但她的出现总能为聚会增色不少。”

第十三章

告诉我——这个女人是不是疯了？

菲得：我在什么地方？我都说了些什么？我是不是疯了？

琼·拉科恩：《菲得》，第1场第3幕

希尔玛是在1942年的某个时候把弗诺·韦尔克从劳动院中接出来的。她在劳动院的时候，告诉院长希尔玛是个“半犹太人”，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出来以后，她又说接她出来的是霍斯特而不是希尔玛。

克劳斯·迪耶特尔是在1943年3月28日出生的。在此前不久，希尔玛与弗诺·韦尔克大吵了一架。起因是她偷了布伦希尔德的一些食物配给卡，其中有些是额外提供给孕妇的。希尔玛要求弗诺·韦尔克将它们还给布伦希尔德。这令弗诺·韦尔克大为恼火。她径直来到当地征兵办公室，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将希尔玛应召入伍。征兵办室的人无论怎样向她解释，她都感到不满意。克劳斯·迪耶特尔出生后，弗诺·韦尔克到医院去看望布伦希尔德并告诉她既然征兵办公室不征召希尔玛入伍，她打算要求另外的有关部

门把希尔玛送到波兰去，并且让他永远不再踏上德国的土地。

在 1958 年 1 月 15 日，布伦希尔德写给有关机构要求赔偿的信中，她这样写道：

当时弗诺·韦尔克的那番话令我感到非常震惊。现在我已想不起是怎样回答她的了。当时刚生了孩子，身体虚弱，也没有能力阻止弗诺·韦尔克。第二天，我把弗诺·韦尔克说的话告诉了我的未婚夫，希望他能够劝阻弗诺·韦尔克。

弗诺·韦尔克是否意识到她的那些话可能给希尔玛带来的严重后果？

当时是 1943 年，在波兰对犹太人的处决正进入高潮。弗诺·韦尔克可能了解这个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么她就是有意要除掉希尔玛，因为她不喜欢希尔玛，而且希尔玛还会影响她与另一个养子霍斯特的感情。也许弗诺·韦尔克不知道犹太人遭到惨无人道的屠杀，而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被驱逐的犹太人受到某种迫害。也许像许多其他德国人一样，她不愿意去深究这类问题。如果这样，那么她想的仅仅是把希尔玛赶出家门而已。

古德伦虽然对弗诺·韦尔克的印象不深，但她认为弗诺·韦尔克很坏。用她的话来说，弗诺·韦尔克像童话中的巫婆一样恶毒。

1939 年 3 月，即战争爆发前 6 个月，弗诺·韦尔克到当地的纳粹党部去举报希尔玛，她说：“我的儿子希尔玛一定是个犹太人，你们能调查一下吗？”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的屠杀还没有开始，因此她可能没有想到过要除掉希尔玛。她可能仅仅是想利用纳粹对犹太人的仇恨来惩罚一下希尔玛，以化解她对希尔玛的不满。

但1943年6月的形势与1939年3月完全不同。也许因为长期的吸毒、监禁和遭受空袭，她成了一个偏执狂。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她在1939年3月仅仅是想教训一下希尔玛，而到了1943年6月却想永远除掉希尔玛。我想主要的原因还是希特勒领导的纳粹政权的反犹主义的影响。虽然战争爆发以前纳粹就以反犹太人著称，但反犹活动在战争爆发后才达到高潮。弗诺·韦尔克虽然本人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但她时时刻刻都生活在浓厚的反犹气氛中，难免不受影响。有时这种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你看过电影或电视上希特勒对群众发表讲话，你就会明白希特勒的巨大蛊惑力。

有一次弗诺·韦尔克径直来到盖世太保的办公室，要求他们调查希尔玛是否是个犹太人。

盖世太保的军官后来这样问布伦希尔德：“告诉我，这个女人是不是发疯了？”

1943年的时候，弗诺·韦尔克的腿有些毛病。如果遇到空袭，通常都得由希尔玛背她到地下室。但后来她总是说背她的是霍斯特，不是希尔玛。到1943年的年底，希尔玛和布伦希尔德的处境已变得非常危险。有一次，他们一起去探望生病住院的弗诺·韦尔克。

“你现在是唯一能够帮助我的人，”希尔玛当时对弗诺·韦尔克说。

弗诺·韦尔克听到这话后勃然大怒：“不要来烦我，不要来烦我！”她对希尔玛嚷道。

“我们走吧，”布伦希尔德对希尔玛说。“你的母亲简直是铁石心肠。”

但希尔玛叫布伦希尔德不要那样说。他告诉布伦希尔德他很爱他的母亲，而且不相信母亲会做任何对他不利事情。

第十四章

莉莉·玛莲

电话响了。“我是沃尔德内拉。我已经找到《莉莉·玛莲》这首歌的歌词。”《莉莉·玛莲》这首歌让我想起一个神奇的女人，一个人人都认识但无人了解的女人。

汉纳·西古拉

1935年茨威格曾提醒过汉斯·埃伦斯要他注意纳粹已经开始了黑暗的统治。五年之后的1940年，一切迹象都似乎表明纳粹不仅赢得了政权，而且还很有可能赢得那场战争。

让我来设想一下汉斯·埃伦斯当时的心态。一方面，茨威格的人道主义对他很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他又得讨好汉斯·亨克尔。可以想象要平衡这两个方面需要巨大的努力。像其他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不愿意逆潮流而动，做反抗希特勒的勇士。而且当时纳粹德国正处于它的辉煌时期，希特勒的统治非常稳定。再说利用汉斯·亨克尔的关系，他不用到战场上去服役，而只是以部队书籍供应商的身份为战争服务。而他的妻子奥德特则可以经常举办聚会，结交柏林文艺界的精英人士。这些聚会让汉斯·埃伦斯受益

匪浅。他的事业因此而蒸蒸日上，不久他就开办了自己的出版社。

是奥德特首先向我提起歌手雷莉·安德森，她的名字永远都和歌曲《莉莉·玛莲》联在一起。1943年11月22日，奥德特参加了雷莉·安德森的经纪人开的一个聚会。彼得·弗林奇后来告诉我，在奥德特的沙龙上，他也见到过雷莉·安德森。

我只知道雷莉·安德森演唱过《莉莉·玛莲》这首歌，但对她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我因此对她很好奇，后来我去图书馆查到了她的一些资料。

她比汉斯·埃伦斯小8岁，也出生在德国北部。她长相非常漂亮，最早是做演员的，后来又成为专业歌手。她结过一次婚，生有两个孩子，但后来又离了婚。30年代她去了瑞士，并被苏黎士歌舞团聘用。在苏黎士期间，她爱上了犹太作曲家罗尔夫·利伯曼。

1934年利伯曼邀请她去阿斯科拉旅游并在那里向她求婚。但苏黎士歌舞团的团长柯特·赫斯菲德劝她不要接受求婚。他的理由是，纳粹德国迟早要入侵瑞士，如果她嫁给了犹太人，无异是自取灭亡。

雷莉·安德森憎恨纳粹德国。但1938年，她因为负债不还而被驱逐出瑞士，她当时不得不回到德国，靠在慕尼黑和柏林的餐馆中唱歌谋生。她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歌唱事业。她以后的歌唱生涯神奇地和《莉莉·玛莲》这首歌联在一起。那时人们一提到《莉莉·玛莲》，马上就会想到雷莉·安德森，反之亦然。

雷莉·安德森的自传于她死后两年的1972年出版。汉斯·埃伦斯对这本自传的写作和出版起了重要作用。他以前的同事告诉我，他们很早就料到汉斯·埃伦斯会编辑出版这本自传，他们甚至怀疑汉斯·埃伦斯是这本自传的真正作者。

《莉莉·玛莲》这首歌的歌词是诗人汉斯·勒普在一战期间创

作的。十年后，罗伯特·舒尔给这首歌谱了曲。不久以后，这首歌每晚都在9点57分播出，三分钟后是例行的新闻广播。每当此时，交战双方都会停止战斗来收听这首歌曲。安德森那富有磁性并略带忧郁的嗓音不仅深深地打动了德国士兵，也打动了盟军士兵。这首歌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表达了怀旧、和平以及友爱这些人类的基本感情，并且暗示和平与友爱必将战胜战争与仇恨。戈培尔后来发现这首歌不但不能激励德国士兵为纳粹冲锋陷阵，反而会大大地打击部队的士气，降低德国军队的战斗力。不久之后，他下令禁止电台播放这首歌。

到1942年3月，德国的辉煌时期已经结束，纳粹开始面临严峻的形势。德国军队并没有像他们预计的那样攻陷莫斯科，而且美国也向德国宣战。许多人预测德国将在不久后输掉这场战争，而且结局将比一战结束时的1918年更惨。当时蕾莉·安德森已经非常出名了，她觉得时机已到，应该做些什么来避免战争带来更大的伤亡。于是她与柏林的好朋友联系，看看她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通过朋友的介绍，她认识了汉斯·埃伦斯。朋友告诉她，汉斯·埃伦斯是她的同乡，并且非常崇拜茨威格。

汉斯·埃伦斯邀请安德森到他家作客。他们后来经常一起散步，一起逛书店。他们之间的信任逐渐加深。有一天，汉斯·埃伦斯突然问安德森：“你有勇气为反战组织做些工作吗？”

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她当时不明白汉斯·埃伦斯的意思，因此她回答得很暧昧，汉斯·埃伦斯怎样理解都可以。

几天以后，汉斯·埃伦斯带她去见了作家威森伯恩，他是反战组织的成员。威森伯恩写过许多宣传和平主义的书，但都在1933年被纳粹焚烧了。1936年他去了美国，在纽约做记者。但不久之后他又回到德国，因为他认为，在德国他能为反战运动做更多的事。威森伯恩在认识安德森的6个月之后被捕入狱，但他却因此而幸

免于难。反战组织后来遭到破坏，他的同志都遭到纳粹的处决。战后他写了一本关于德国反战运动的书。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发现有提及汉斯·埃伦斯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安德森讲的不是实话。也许汉斯·埃伦斯与威森伯恩的交情很深，这一点可以从奥德特的来宾留言薄上看出来。在1949年9月24日的留言中，他这样写道：

我们最终又团聚了。希望从此以后我们永远不会分离。非常感谢主人热情的款待。

雷莉·安德森是在一间小阁楼上与威森伯恩第一次会面的。威森伯恩告诉她该怎样为反战运动效力。首先她应该想办法参加宣传部组织的演出慰问团，慰问团的成员都是演艺界的明星，他们的任务是去波兰慰问德国士兵。到达波兰之后，安德森应该尽量了解波兰集中营以及地下军工厂的情况。离开柏林前，威森伯恩会再次与她联系，向她详细交待任务。

安德森利用关系，很快参加了下一次的慰问团。这一次的负责人是汉斯·亨克尔。

在她离开柏林前，宣传部为安德森拍了一部新闻短片，准备在慰问演出时给士兵放映。但戈培尔看过这部片子后，很不满意，因此后来就再也没有放映过。

在她出发前的一两天，安德林给汉斯·埃伦斯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奥德特。她告诉安德森，汉斯·埃伦斯不在家，可能去了歌剧院。

这是他们之间的密语，意思是叫安德森到小阁楼去。安德森到达小阁楼的时候，反战组织正在召开一个会议，但是埃伦斯和威森伯恩都不在场。她知道有人在监听盟军电台，就问当天晚上是否有空袭。监听人员告诉她，由于接收效果很差，他们也不知道是否会

有空袭。

演出慰问团的火车最后终于出发了。那天晚上亨克尔进行例行的巡查。他打开安德森所在车厢的门，用电筒扫视里面的演艺明星，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安德森。

“哦，新来的，”他说，“嗨，希特勒！”

“你最好说你的名字，而不要说希特勒，”安德森说，“我的名字叫雷莉·安德森。”

“嗨，希特勒！”亨克尔又重复了一遍，然后关门出去了。

第二天，演员们改乘汽车来到华沙。晚上，他们住在一家旅馆里。深夜两点半，安德森听到有人在敲门。

“慰问演出团团长命令安德森立即到楼下去。”

“告诉他我已经睡下了，不想起来做其他事情。”安德森回答道。

几分钟后，亨克尔亲自来敲门，并在门外叫道：“亨克尔不允许有人违抗他的命令。”

安德森不得不来到楼下。

楼下的舞池简直就像个游乐场。亨克尔已经酩酊大醉。当他看到安德森时，他大声宣布：“现在请著名歌星雷莉·安德森演唱。”他向她走过去，当他靠近她时，他开始小声唱起《莉莉·玛莲》。他把耳朵凑近安德森的嘴，并说：“我什么都没听到，怎么不唱？”一个同伴推了推安德森，示意她不要违抗亨克尔的意愿。安德森就开始唱了起来，唱完后，当她正准备回到房间时，亨克尔向她吼道：“你站住，乐队请奏乐，现在安德森要和我共舞一曲。”他接着把安德森拖进舞池，嘴里散发着浓烈的伏特酒味，并不停地胡言乱语。安德森非常气愤，给了他一耳光。接着她马上跑回她的房间，收拾好行李来到楼下，并准备随时接受逮捕。旅馆行李员的兄弟用

卡车把她送到库特鲁，在那里她可以赶早晨的火车到柏林。在送她去库特鲁的途中，行李员的兄弟向安德森讲述了波兰人遭受的苦难。他希望安德森能把这些情况报告给罗马教廷和红十字会。

安德森回到柏林后，向反战组织汇报了她此行的调查情况。在戈林手下的帮助下（戈林一派与戈培尔一派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相互争斗），安德森逃离柏林，去了意大利。另外她被告知不得再进行公开演出。后来，汉斯·埃伦斯开始作为中间人，调解她与亨克尔的关系。汉斯·埃伦斯对她说：“你是一名有影响的艺术家，反战运动需要你。”最后，亨克尔终于与安德森和解，并允许她可以继续演唱。安德森在1943年5月底的日记中写道：

我愿意和你和解是因为考虑到你的孩子在前线为德国作战，但从此以后你不许再与《莉莉·玛莲》这首歌有任何联系。”亨克尔当时这样对我说。他然后站了起来，接着说：“你知道你有多么幸运吗？我的妻子因为一个小错就被送进集中营关了四个月。如果没有我的帮助，你的结局也是一样。”

第十五章

现在只有元首能够帮助你

1945年5月1日的晚上，电台公布了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德国人民终于摆脱了这个恶魔，希特勒的魔力也从此消失。

阿尔伯特·斯比尔：《第三帝国的内幕》

卡尔·伯索尔德1924年后一直在就业办公室工作。他是个私生子。在纳粹上台以前，他妈妈在填有关表格时，在丈夫一栏里，填了个犹太名字。

伯索尔德1933年被就业办公室解雇。1938年11月23日，他给元首——德国总理希特勒写了这样一封信：

……敬爱的元首，现在我正处于极度的绝望之中，希望你能够帮助我。现在只有像你这样高贵、善良、伟大的人才能拯救我。

请允许我把我的情况讲给你听。过去五年里我忍受的苦难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如果一个男人连工作都失去了，他还如何继续生活下去？我25年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完全被破坏了。我经常想是

不是死去比活着还更好一些？

元首，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全都是德国人的血，我拥有纯粹的德国人的心灵和精神。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犹太人，也没有听说过犹太人，更不想与他们有任何瓜葛。我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长大。我的祖父为德国战斗了40年，参加过1864年、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我1933年3月13日参加纳粹党，并且担任领导职务一直到1935年。我的两个儿子，汉斯和西格弗雷德都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而且大儿子已经在前线为祖国战斗了三年。

敬爱的元首，如果你能够提供帮助，我将万分感激。

1939年8月6日，伯索尔德的要求得到批准，当局重新恢复了他的工作。

1944年1月11日，希尔玛接到通知，他已经正式被确认为犹太人，必须立即到警察总部去报到。

如果希尔玛是军人，他还可以就这个裁决提出上诉。但他是个平民，连上诉的权力也没有。

到1945年纳粹开始实施对犹太人大灭绝计划时，犹太人与“半犹太人”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虽然按规定，半犹太人不在被处决的人之列。虽然纳粹党和冲锋队的人要求执行激进的种族政策，但有关政府机构对此都并不是很热心，他们有时甚至想办法保护“半犹太人”。这也说明纳粹政权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在1944年1月12日以前，警察总部只是不时地警告希尔玛，但却一直未对他采取行动。这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克劳斯在警察总部任职，他曾多次告诉希尔玛，他要想办法让希尔玛平安地度过

这段非常时期。但在希尔玛被宣布为犹太人后，克劳斯离开了警察总部，接替他的那位警官曾在1939年拒绝过希尔玛参军的申请。

有一次，这位警官把希尔玛叫进他的办公室，把一只手枪放在桌子上，然后就出去了。

几分钟后，这位警官回到办公室，看到希尔玛没有开枪自杀，不禁勃然大怒：“你这个胆小鬼，犹太猪，快给我滚出去！”

希尔玛回家时，布伦希尔德发觉他脸色非常不好。问明原由后，她打算到警察总部找那位警官论理。希尔玛劝阻她说：“这样做没有用，反而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希尔玛被宣布为犹太人之后，他必须穿规定的犹太人服装，上面有黄星标识，而且他也只能领取犹太人专用的食物配给卡。这意味着食品店有权不卖给他食物。有几次空袭时，同楼的人不允许他进入地下室躲避，他只好和布伦希尔德呆在楼上的家里。

因此布伦希尔德经常从衣服上取下黄星标识，到必要的时候，她又把它们缝上去。有一次，布伦希尔德和希尔玛一起去看足球赛，当时希尔玛没穿带黄星标识的衣服。不巧的是，球场当值的警官认识希尔玛，于是布伦希尔德不得不站到希尔玛的身前好挡住警官的视线。

但最糟糕的是，由于希尔玛被确认为犹太人，他就不能继续在科伯公司工作了。在他的就业档案上登记的工作终止时间是1944年1月15日。但科伯公司想再让希尔玛工作一个月，好让公司有时间找到接替他的人。希尔玛同意了，于是又继续工作了一个月。按规定，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如果被发现，将会受到严惩。

布伦希尔德于是去找科伯公司的老板，希望他能在就业档案上把希尔玛的工作终止时间从1944年1月15日改到1944年2月15日，但是老板拒绝这样做。

布伦希尔德说：“如果是我的老板，肯定会同意这样做。”

“那你是一个幸运的小姐。”科伯公司的老板略带几分讽刺地回答。

希尔玛对生活感到极度绝望。一天早上，他写好一封诀别信，然后打开厨房的煤气。当时弗诺·韦尔克腿病犯了，正在住院。但出人意料的是，弗诺·韦尔克几小时后突然回来了，发现希尔玛已倒在地板上，人事不醒。她立即关掉煤气并报了警。整整5个小时以后，弗诺·韦尔克才让一个邻居去通知布伦希尔德。当布伦希尔德急匆匆地赶到家时，韦诺·韦尔克正平静地坐在桌旁给霍斯特写信，而她的丈夫希尔玛仍躺在地上昏迷不醒。布伦希尔德马上把希尔玛送进医院，经过抢救，终于活了过来。

到1944年3月份，希尔玛的精神状态有所好转。他决定和布伦希尔德一起去柏林，看能不能让有关部门撤消他的犹太人身份。虽然规定犹太人不能出门旅行，但希尔玛现在已顾不得这么多了。

他们首先来到内政部。布伦希尔德进去询问，而希尔玛则留在外边等她。内政部一位官员告诉布伦希尔德，这种事情由安全总局（即盖世太保）负责，建议她到那里去咨询。

于是，他们又来到安全总部办公大楼，这次还是希尔玛在外边等候。接待布伦希尔德的是盖世太保的军官潘奇洛，他看上去很和善，并且很客气地听了布伦希尔德的陈述。

“顺便提一下，”布伦希尔德，“我的丈夫正等在外边。你能让他进来谈一谈吗？”

“但犹太人不准旅行！”潘奇洛叫道。“我建议你离开你的丈夫。”潘奇洛接着说。

布伦希尔德问潘奇洛是否结了婚。

“是的。”

“那你有孩子吗？”

“有。”

“那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不能离开的丈夫。现在有谁能帮我?”

“只有元首能够帮你。”

“我怎样才能见到他?”

“我想只有等到战争结束后。”

两天后的夜里11点钟,盖世太保的军官沙汉姆斯逮捕了希尔玛。一个月之后,沙汉姆斯又逮捕了布伦希尔德。这位军官告诉布伦希尔德,她刚一离开安全总部,潘奇洛就与他联系,叫他逮捕希尔玛,并嘱咐他一定要亲自去办这事。

第十六章

我们向元首宣誓

“我召唤来的精灵，我无法把它摆脱。”

约翰·沃尔夫岗·冯·歌德：《巫师的学徒》

奥德特最后一次见到土耳其分支的冯·莫克勒家族成员是在1922年。当时她只有11岁，正准备与母亲搬出城堡，到美因河边的别墅去住。从那以后，奥德特就与城堡内的亲戚失去了联系。1943年的夏天，奥德特又回到城堡，看望居住在里面的亲戚。她发现如果柏林遭到轰炸，城堡是一个避难的好地方。

“我是奥德特，”她说。“你们还记得我吗？”

城堡里的亲戚都还记得她。他们同意给奥德特一家，包括她的母亲提供两三间房子，供他们避难用。

这几间房子很快就派上了用场。11月22日晚上，柏林遭到空袭，柏林西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奥德特与汉斯·埃伦斯的家也位于西区，他们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第二天，奥德特一家就搬进了城堡。自此以后，汉斯·埃伦斯也只好将城堡作为他出版社的办公室。

汉斯·埃伦斯继续竭力与汉斯·亨克尔搞好关系。1944年2月，他送给亨克尔一磅从法国带回的咖啡。他还把城堡的电话告诉亨克尔并邀请他方便的时候到城堡去作客。他还特别提到，如果奥德特见到汉斯·亨克尔，她将非常高兴。

3月，汉斯·埃伦斯加入空军少将阿道夫·格兰德指挥的部队。阿道夫·格兰德是德国军队最年轻的将军，他的总部设在柏林。汉斯·埃伦斯向将军提出一个建议：出版一本宣传杰出飞行员的小册子，并争取戈林元帅的支持。

毫无疑问，汉斯·埃伦斯希望通过出版这本小册子，来拯救濒临倒闭的出版社，而且这样他还能将他的部队生活与出版事业结合起来。但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遇刺事件发生以后，纳粹政权强化了对人民的监视和统治。成千上万的人仅仅因为遭到怀疑而被处决。任何人，只要他不是百分之百地效忠希特勒，都可能遭到迫害。这让汉斯·埃伦斯感到非常紧张，如果有人揭发他与雷莉·安德森的关系，他立即就会受到惩处。更不要说他与反战组织的交往了，还有他出版的茨威格的著作。像他这样的人随时都面临着危险，虽然他并没有参加、策划谋杀希特勒的行动。

因此汉斯·埃伦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汉斯·亨克尔这个朋友，为了他自己，同时也为了奥德特。

希特勒遇刺事件后不久，汉斯·亨克尔就给汉斯·乔斯特写了封信。汉斯·乔斯特是当时的著名作家，德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在信中，汉斯·亨克尔说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打算对可疑分子采取坚决行动。

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了汉斯·亨克尔在当时所起的作用：

1944年7月20日以后，汉斯·亨克尔成为纳粹德国的最高

文化官员，并具体负责宣传部的电影局。在希特勒的指示下，他领导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反映“人民法庭”审讯和处决可疑分子的实况。其场面非常残酷。据说在放映过程中，就连戈培尔也不愿直视那些镜头。

7月31日，汉斯·乔斯特给亨克尔回了信：

你的来信让我异常喜悦和激动。对你信中的所有观点我都衷心拥护。我决心要像你那样准备为希特勒的伟大事业奉献终生。但我们还应注意到，在作协内部还有很多在信仰问题上犹豫不决的人。他们像狐狸一样狡猾，在对希特勒的忠诚问题上始终不肯明确表态。我要让赫伯特·门兹给这些人写信，一定要让他们每一个都为希特勒效忠。

接着在信中汉斯·乔斯特特别强调，这些信应该首先写给那些诗人。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成为希特勒的忠实信徒，就像每一个鞋匠、裁缝、士兵一样。

我准备与赫伯特·门兹共同起草这些信，并与你一起决定具体该寄给哪些诗人。

没有证据表明汉斯·埃伦斯后来也收到过赫伯特·门兹寄出的要求他宣誓效忠的信。但他肯定知道有人收到过这样的信。他感到很大的压力，而且认为仅仅宣誓效忠还远远不够，因此他向亨克尔建议，把那些宣誓效忠的文章都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书名叫《我们向元首宣誓》。亨克尔和汉斯·埃伦斯就此事找过汉斯·乔斯特，希望能得他的支持。乔斯特非常乐意地答应了他们。

但汉斯·埃伦斯现在还面临另外一个麻烦的问题，有关部门

要征召奥德特进军工厂做工。

1944年7月27日，埃伦斯就此事写信给亨克尔：

今天我一到克拉多就接到奥德特的电话，她告诉我就业办公室准备把她召进军工厂。你知道我没有秘书，而且也请不起秘书。我的妻子帮了我不少的忙，如果失去她，我将很难继续我的工作。

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建议指定她参与编辑《我们向元首宣誓》这本书，这样就业办公室就不会让她进军工厂了。

8月30日，汉斯·亨克尔给乔斯特写信，让他找就业办公室接洽。希望就业办公室不要召奥德特进军工厂，理由是编辑《我们向元首宣誓》这本书需要她的帮助。

8月25日，汉斯·埃伦斯向汉斯·亨克尔提了另一个建议：

我建议我们先编辑出版五位最杰出的冲锋队军官的英勇事迹，希望德国的年轻人能向他们学习，成为为希特勒而战的勇士。

但9月4日，汉斯·埃伦斯得知他的出版社即将被当局关闭，理由是出版事业与当前正在进行的战争没有多少联系。汉斯·埃伦斯于是立即向汉斯·亨克尔求救：

关于英雄飞行员的小册子马上就要开始印刷了。《我们向元首宣誓》这本书也马上就要编好了。我认为这本书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在现在这个关键时期，每个人都应该向元首表示他的忠心。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打算关闭我的出版社。我参加纳粹党已经很多年了，而且对我们敬爱的元首一直忠心耿耿。

你能不能向戈培尔或他的手下谈谈我的情况？你可以告诉他们，关闭我的出版社并不能为政府增加多少财产。再说，我已经加

入了空军。我相信考虑到这些情况，有关当局会撤消关闭我的出版社的决定。

9月9日，汉斯·埃伦斯写信给亨克尔说，他不喜欢《我们向元首宣誓》这个书名。他建议用一个意义更强调的书名——《我们的誓言》，附标题为“德国人向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

9月21日，乔斯特签订了《我们向元首宣誓》这本书的出版合同。但紧接着又一个难题出现了，由于战时物资极度缺乏，他们找不到纸张印刷这本书。汉斯·埃伦斯不得不又向亨克尔求助：

我想这本书出版后，将大量供应前线的部队。我想不通纳粹党为什么不支持出版这样一本重要的书。我希望你能帮我解决印刷纸张问题。

9月22日亨克尔写信给乔斯特：

我刚刚与门兹讨论了我们即将出版的那本书。总的说来，我们收到的稿件还令人满意。不久前汉斯·埃伦斯给我写了信说，他找不到印刷用的纸张。我会亲自过问此事，如果有必要，我会向戈培尔反映。

9月25日，汉斯·埃伦斯接到另一份通知，告诉他文化界也要进行“全民总动员”，他必须马上关掉他的出版社。这一次是最后通碟，不容许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两个月后，奥德特关于免除军工厂工作的申请也被正式拒绝。

第十七章

狱中的通信

午夜时分，一位冲锋队的军官巡视了医院。他在每一个病房都指定了一名负责人，让他拟一份病人的名单，并且一定要注明是否为犹太人。德国人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他们的种族论。

蒲莱姆·列维：《集中营的生活》

希尔玛是在他被捕10天后的4月8日写第一封信给布伦希尔德的。

我最亲爱的布伦希尔德：

你可以看出，我在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给你写信，表达我对你的思念。因为复活节假期，火车要在这里停留一周。然后我们经布莱斯洛和格莱维茨，最后到达奥斯威辛。在这两天的行程中，我碰到的每个人都认为我是无辜的，他们都很同情我这个不幸的人，并给了我不少建议。

我现在结识了两位好友，一个是捷克人，另一个从布莱斯洛

来。他们对集中营的生活都非常了解。布莱斯洛的那位朋友自己就在集中营生活过两年。捷克的那位朋友(这封信就是经过他的亲戚转寄的)认识许多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关押过的人。据他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生活异常艰苦。我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后,将首先得度过6个月的隔离期。在这期间,除了锻炼身体之外,我不必参加劳动。真正的生活是在6个月之后开始的。

以后写信我将不得不仔细斟酌字句,很多话我不能明说,你要从字里行间去体会。在这种处境之下,我必须十分小心谨慎。

我现在很为你担心。如果你现在不是有孕在身,我即使身处集中营,心里也会轻松一些。但愿空袭不会给你带来太多麻烦。

现在火车经过的这个小镇景色优美,但我只能在铁窗里欣赏,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我现在开始结识越来越多的犯人。火车上的环境非常恶劣,到处都是跳蚤。

可能你已经注意到,现在我情绪变化很快。我情绪最坏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左右,那是我们的起床时间。下午五点左右和晚上睡觉前我的情绪也不好。但现在我已经开始慢慢地适应了这种生活,并且也变得乐观起来了。

明天就是复活节了,很遗憾我们不能在一起度过这个节日。但不要为我忧伤,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比较幸运。

如果你要寄给我包裹,请用足球报、体育报或其他登有前线战斗消息的报纸做包装。要到星期二,4月4日我才能读到这些天的柏林报纸。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这次就写这些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收到这封信。也许下封信我会从布莱斯洛寄出。

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我不希望回来后看到的是一个苍老、憔悴的妻子。

愿你和我们的孩子一切平安。

你的希尔玛

希尔玛的下一封信是五个月后在索斯洛威克劳动营写的。这个劳动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部分，位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北75公里。这封信很可能是寄给内斯特·加德伦的。他是布伦希尔德的老板，一位真正的反纳粹勇士。只要希尔玛在信封上不写集中营的地址，他愿意替他转交寄给布伦希尔德的信。按照当时的法律，布伦希尔德不能与希尔玛通信，因为他已被确认为犹太人，而且已被送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但希尔玛的养母弗诺·韦尔克则可以和希尔玛通信，而且还可以给他寄包裹。

因此，第二封信的收信人写的是弗诺·韦尔克。当时弗诺·韦尔克在一家老人院里负责管理食堂。信是这样写的：

希望老人院的工作让你感到满意。每次生病时，我都在想，如果有你在身边照顾我，那该有多好啊！我也想念霍斯特，我还记得上次他来集中营看我的情景。时间过得真快呀，那已是六个月之前的事了。现在这里的气候已开始变得寒冷起来。除了工作服以外，我们没有其他衣服。但我很幸运地搞到一双皮鞋。

很感谢你寄来的包裹。你不知道，收到包裹时，我有多么激动。我的朋友都羡慕我有一位这样好的母亲。

哦，妈妈，有时候我非常伤心。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和我的妻子。你也曾经被关押过，一定知道那种日子有多么难熬。但最令我痛苦的不是物质生活的艰苦，而是文化生活的贫乏。集中营里没有音乐，没有书籍。劳累一天后，面临的是寂寞难耐的漫漫长夜。

集中营里的很多人已被关押多年，他们大都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他们觉得随时都可能被处决。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会

重获自由。

这封信写得比较长，但这些心里话我只有说给你听，因为母亲最能了解孩子的心情及感受。

你的儿子：希尔玛

下一封信写于10月17日，收信人写的是布伦希尔德和弗诺·韦尔克。

亲爱的布伦希尔德，亲爱的妈妈：

你们的回信已于10日收到。遗憾的是信中没有提到霍斯特的近况（霍斯特已在法国被俘）。

在集中营里，我认识了一位波兰工人。他愿意替我收信件和包裹。他的哥哥也住斯德丁，因此他希望你们能经常让他了解他哥哥的情况。我想你们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收包裹的日子是每个星期六。能收到包裹的人很少，因为绝大多数人在德国都没有雅利安血统的亲戚。就像我以前告诉你们的一样，我最需要的是面包，如果有可能，最好每周都寄给我一些。

在集中营里，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例如轻松的工作，好的毯子和好的食品。如果你们能每月寄给我二三十马克那就好了。当然，你们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布伦希尔德和孩子的需要。

下次你们可以把我的蓝毛衣和黑围巾寄过来。现在这里气候已变得非常寒冷，但每天劳动回来后，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这样下去肯定会得病。但愿不会在这个集中营度过整个冬天。

如果整个冬天我们都得呆在这个集中营，寒冷的天气和食品的缺乏对我们生命是两大威胁。但有你们的帮助，我坚信我一定能

挺过去。刚才已经提到我需要毛衣和围巾，另外还有手套和袜子。除了衣物以外，还可以给我寄一些书来。但不要精装本，平装本就行了，因为在集中营里东西很容易丢失。另外再给我寄几张布伦希尔德和孩子的照片，最好再寄几张我以前的照片，我好让集中营的难友看看我原来的样子。

告诉我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和她的名字。布伦希尔德，我真为你感到自豪。你是一个坚强、伟大的女性。真希望我能马上恢复自由，来照顾你和孩子。我现在不想给你许下任何宏伟的诺言，我会用行动向你们证明，你们对我的关爱没有白费。

我在这里一切都还不错，请不要再为我担心。因为我已经给你们带来了许多忧伤和痛苦。

你们的希尔玛

下面这封信是希尔玛写于 11 月 8 日的。

来信已经收到。寄来的毛衣昨天也收到了。我的情况没有多少可写的。我现在的健康状况还凑合，只是时常患感冒。但现在有了毛衣，可能情况会变得好一些。

集中营里的食物越来越糟糕，特别是每天喝的汤很不卫生，我的腿因此而发肿。一想到这些，我就担心自己还能不能活着走出集中营。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非常乐观的。

希望你们不要花费精力去确认我的雅利安血统，这样做只会给你们带来麻烦。但你们可以想办法替我争取瑞士护照。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以前为此作过努力，但没有成功。如果我持有瑞士护照，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当然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希望你们很快有霍斯特的消息。不过我想战俘是不会吃多少苦头的，而且他们还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像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来信中谈到斯德丁遭到轰炸，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被炸毁，包括我们的公寓。这让我感到非常伤心。一提到我们的公寓，我们的家，我就想起我们在里面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而现在，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这多么令人伤心啊！

亲爱的妈妈，非常感谢你的鼓励。相信我，我永远都是你忠实的儿子，以后我会尽力让你少为我担心。

布伦希尔德，我的好妻子，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真爱。如果我能重获自由，我会用我的全部精力来报答你的爱！

让我向上帝祈祷，请他把健康赐给你和孩子，把自由赐给我。

你们的希尔玛

第十八章

阿克塞尔

当我头发花白、老态龙钟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来看你，请一定给我倒一杯新鲜的冷啤酒。如果当时你正忙于读报，没有时间，就请瓦尔特给我倒一杯吧。

安克斯尔·埃伦斯：《慕尼黑的啤酒屋》

1989年夏天，当我采访奥德特的时候，她告诉我她的儿子阿克塞尔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新闻记者。他获得过俄根—爱尔文—凯斯奇奖，但就在得奖5周后他自杀了。回到加拿大以后，我开始了解这个奖的情况。了解的结果是：俄根—爱尔文—凯斯奇奖是一本名为《严厉》的杂志颁发给每年的最佳作者的一种奖项。我随即给《严厉》杂志去信，向他们了解阿克塞尔·埃伦斯的情况。

杂志社寄给我两张剪报：

阿克塞尔是德国最有才华的记者之一，同时又是一名优秀的赛车手和摄影师。六月初他获得《严厉》杂志的俄根—爱尔文—凯斯奇奖。获奖作品是一篇名为《上帝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文章。阿

克塞尔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成功的小说家，但他的处女作却被退了稿。他生性忧郁。上周他上吊自杀，死时年仅47岁。

《严厉》1986年7月24日

他是一位明星记者兼赛车手。五星期之前他获得俄根—爱尔文—凯斯奇奖。在那之前，他刚完成他的第一部小说，但被出版社退了稿。

上周阿克塞尔·埃伦斯在他慕尼黑的家中上吊自杀。

他生性忧郁孤僻，经常在酒吧中独坐。

他对自己的期望非常高，对自己的作品总是力求最好。他花了大量心血来完成他的第一部小说，但最终还是被出版商拒绝，理由是小说写得不够精彩。

这事对他的打击很大，自那以后他变得更加消沉和沮丧。上周他终于上吊自杀。

《比尔德》1986年7月21日

1990年夏天，我去慕尼黑采访了阿克塞尔的前妻莫尼卡·埃伦斯。她与阿克塞尔离婚后一直与奥德特保持着联系，在奥德特晚年经济状况不佳时，还经常帮她变卖一些珠宝首饰。就像每一个认识奥德特的人一样，莫尼卡·埃伦斯非常喜欢她的岳母。

但她一点也不喜欢岳父汉斯·埃伦斯。她说岳父是一个脾气暴躁、倔强的人，晚年失去了许多他原来的朋友。

“阿克塞尔小时候很有表演天赋，出演过好几部影片。当时他被人称作童星。”莫尼卡说。

“他的父母一定为他感到自豪。”我说。

“他的妈妈是这样，但他的父亲却不是这样。父子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们经常吵架。奥德特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来平息他们之间的争吵。”

我说汉斯·埃伦斯一定是妒嫉他儿子取得的成就。

“他从来就不理解他的儿子。他希望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印刷商，而不是一个作家。”

在我们的谈话即将结束时，我问她是否认为汉斯·埃伦斯曾是一个纳粹党人。

“当然不是，”她说，“虽然他有些激进，但并不是纳粹。”

我告诉她汉斯·埃伦斯与汉斯·亨克尔经常通信，信的内容足以证明汉斯·埃伦斯是一个纳粹党人。

“请注意，”她说，“在那个年代，人们为了生存，可能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我最后告诉她我为什么对奥德特这么感兴趣，并且解释说在第一次采访中，我没有向奥德特透露我与她的亲戚关系。我说在下次采访中，我打算告诉奥德特我的真实身份，并且告诉她按照纳粹的定义，奥德特是一个“半犹太人”。

但莫尼卡·埃伦斯听了我的这番话，一点也不吃惊。“她总是站在犹太人一边。”她说。

“你是说她已经觉察到自己是个犹太人吗？”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她回答我说，“我的意思是奥德特是一个正直的、有教养的人。她强烈反对纳粹的种族政策，因此很自然地她总是站在犹太人一边。”

第十九章

最浅的深度

母亲的勇气：贫穷可怜的人如果没有勇气，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伯切特：《母亲的勇气和她的孩子》

1944年4月27日，盖世太保传唤了布伦希尔德。逮捕她的是盖世太保的军官钱伯斯，同时他也参加了对布伦希尔德的审讯。在审讯中，他告诉布伦希尔德，德国妇女不应该和外国人交往。

“希尔玛也是德国人。”布伦希尔德说。

对这句话，钱伯斯想不出合适的回答。他接着问：“你和希尔玛到柏林去干什么？”

“我们想去澄清一个错误。”

“这里当然有一个错误，”钱伯斯反驳道，“那就是你和你的未婚夫根本就不应该去柏林，而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

审讯结束后，他带她下了楼。当他们走到街上时，钱伯斯的语气变得和缓了一些，他问布伦希尔德：“你愿意坐车还是走路去看守所？”

“对我来说都一样。”

于是他们就走路去了警察局的看守所，在这里布伦希尔德被“保护性地拘留”。三周半以后，她被释放。

当年9月，盖世太保第二次传唤了布伦希尔德，这次主持讯问的还是钱伯斯。他告诉布伦希尔德，只要她声明在希尔玛被宣布为犹太人以前，她并不知道希尔玛的种族血统，并且保证从此以后再也不和犹太人以及“半犹太人”来往，盖世太保就不会再找她。否则的话，她将面临严厉的指控。

布伦希尔德后来回忆道：“当时我想，这些人简直是发疯了。他们首先宣布希尔玛是犹太人，当然我们的孩子就是“半犹太人”了。然后他们又要求我与犹太人和“半犹太人”断绝一切关系。一个女人怎么能与她的未婚夫及孩子断绝来往呢？我想他们要我作这样一个声明，很可能只是一种例行程序罢了。因此，当时我很乐意地在声明上签了我的名字。”

1945年1月，苏联红军开始逼近波兰集中营。纳粹于是把集中营里的犯人向南驱赶，很多犯人死在这次被人们称作“死亡行军”的途中。但希尔玛却活了下来。他2月2日到达奥地利的毛索森集中营，但当时他身体已极度虚弱，到达后就被立即送进了医院。

美国军队5月5日解放了毛索森集中营，但希尔玛当时已病入膏肓，不得不继续住在医院里。在这期间，他请求当时照看他的红十字会护士特里莎·爱斯伯格替他写了最后一封信。

毛索森

1945年7月14日

亲爱的布伦希德，亲爱的妈妈以及孩子：

我可能要和你们永别了。感谢你们给我的关心和爱护，是你们的关爱一直陪伴我度过这一生。

由于美国军队的逼进，我们被驱赶到毛索森集中营。我是少数的幸存者之一。但因为身体虚弱，到了毛索森后我立即被送进了医院。医院的伙食很差，五个病人每天只有0.75升汤，一块面包和一小块香肠，星期天再加一点奶酪。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病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到现在只剩下二十多人了。

5月8日，美国人接管了医院的食堂。但对我来说，这已经太晚了。虽然饮食大有改善，但还是不能恢复我的体力。而且我还经常遭受腹泻和高烧的折磨。就在前几天，我还高烧40度。而且美国人也没有足够的药品。恐怕我捱不了多久了。

但我想让你们知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还在想着你们。

布伦希尔德，但愿苏联人不会给你带来多少麻烦。请你好好抚养我们的孩子。我今后的情况，护士会写信告诉你们的。这封信也是我请她替我代写的，我现在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

永别了。

8天以后的7月22日，希尔玛死在毛索森的医院里。但13个月之后，布伦希尔德和弗诺·韦尔克才得知希尔玛的死讯。

1951年1月22日，红十字会护士特里莎·爱斯伯格在毛索森的法庭上提供了以下证词：

1945年5月8日，毛索森社区当局要求我作为德国红十字会

的护士去照看毛索森集中营医院里的病人。希尔玛·韦尔克住在我负责的病房里。他患了严重的肺病，大概死于1945年7月22日，具体的日期我不敢肯定。他死后被葬在集中营的墓地。在他死前不久，他叫我代他给他的母亲和未婚妻写了一封信。他母亲的名字好像是韦尔克，而且只是希尔玛的继母。他未婚妻叫布伦希尔德。

我只是模糊地记得在那封信里，希尔玛讲述了他在毛索森集中营的生活，并且他嘱咐布伦希尔德要好好抚养他们的两个孩子。和德国的通讯恢复后，我立即把那封信寄给了希尔玛的母亲。

在写那封信之前，希尔玛多次向我提到他打算与布伦希尔德结婚，并不是因为他们已有了两个孩子，而是因为他们非常相爱。

我记得希尔玛告诉过我他的本名应是内特，韦尔克只是他的继母。他曾向我表示，如果他能活下来，他将去寻找他的生母。

1945年2月27日，苏联人继续向西推进。布伦希尔德带着她的两个孩子逃难到辛洛维辛，弗诺·韦尔克当时在那里管理一个老人院。

很快，苏联人占领了辛洛维辛并逮捕了弗诺·韦尔克。有一天晚上，她被关在老人院的地下院里，老人院的一名女工冒着危险打开地下室，放走了弗诺·韦尔克。

由于食品极度缺乏，布伦希尔德和她的孩子不得不与其他难民一道在几周后离开了辛洛维辛。霍恩贝克的一位农场主收留了布伦希尔德母子，条件是布伦希尔德帮他干一些农活。

几个月后，布伦希尔德在食品与林业部找了一份工作。她希望希尔玛还活着，并能回来与她团聚。1946年7日弗诺·韦尔克也离开了辛洛维辛，后来她与布伦希尔德一起搬到了芒恩。在这里，她们收到了希尔玛的死讯。当时是1946年8月，而希尔玛在13个

月之前就已经死在毛索森集中营的医院里。

霍斯特从战俘营释放后就留在法国，后来他娶了一位法国女子为妻，并有了一个儿子。霍斯特去看过一次布伦希尔德。布伦希尔德告诉霍斯特她认为弗诺·韦尔克应对希尔玛的死负责。霍斯特说他对这事一无所知，他只知道弗诺·韦尔克一直都对他很好。后来，格德鲁恩去看望过霍斯特几次。但他每次都不愿与格德鲁恩谈希尔玛的事，也不许格德鲁恩批评弗诺·韦尔克。霍斯特 1975 年死于癌症。

1960 年，格德鲁恩已经 16 岁了。那时她已经完全了解了父亲希尔玛的经历，但她还是想去访问弗诺·韦尔克，想从她那里了解更多的情况。但布伦希尔德认为这样的访问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此，她规定格德鲁恩在满 22 岁之前不能去看望弗诺·韦尔克。

但格德鲁恩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弗诺·韦尔克死于 1965 年，她死时格德鲁恩还不到 22 岁。

1958 年弗诺·韦尔克给孙子克洛斯寄了一张贺卡。当时克洛斯 15 岁，立志要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药剂师。贺卡是这样写的：

我很高兴得知你打算继承你父亲的事业，成为一名药剂师。你父亲小时候身材不高，但后来他长得又高又大，就像你的叔叔霍斯特一样。

第二十章

树林里的小屋

二战结束后，德国给欧洲留下了一片废墟，但同时也给德国人自己留下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对德国人来说，接受战败这一事实，并准备接受惩罚，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心理承受力的。

弗瑞德奇·塞伯格：《战后的德国》

1944年6月，埃伦斯夫妇和他们的孩子阿克塞尔以及男爵夫人搬出了奥伯海林根的城堡，他们的新家是城堡附近树林的一幢安静的别墅。

1944年10月，苏联人开始向东普鲁士推进。盟军开始对柏林进行长时间的空中打击，整个柏林顿时变为一座死城。这是奥德特的一位朋友从柏林给她来了一封信：

我很高兴地得知汉斯·埃伦斯又加入了德国空军。他在军队里相对要安全一些。

我真羡慕你的林中别墅，真希望能参加你们在那儿举行的聚

会。我现在仿佛看到了中国式的灯笼悬挂在树枝上，你们在草地上跳舞，喝着野草莓做的甜饮料。

虽然近段时间柏林每天都遭到空袭，但这里似乎洋溢着一种节日的气氛，人们通宵达旦地狂欢作乐，完全忘记了战争。也许这是因为柏林人把剩下的每一天都当作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

没有证据显示，战争结束后汉斯·埃伦斯因参加德国空军而受到任何指控，虽然美国人掌握了他与汉斯·亨克尔的通信。从1947年起，他又开始重新成为一名编辑，但后来他再也没能建立自己的出版社。

从1944年到1952年，像其他的德国文人一样，奥德特每次举行聚会后，都要让来宾留言。通常留言簿上写的都是来宾对主人的感激之词，有的是散文，有的是诗歌，有的诙谐，有的严肃，有的画家还附上有趣的漫画。奥德特在柏林开设沙龙时期的许多常客又开始重新出现在她的聚会上，其中包括彼得·弗林奇。

但在聚会上再也没有看到汉斯·亨克尔。战争结束时，他落在了波兰人的手上。波兰人把他当成了盖世太保的头子亨克勒。他被关押了很长时间，多次被审问。最后被驱逐出波兰。他死于1960年。

最近有一篇文章谈到汉斯·亨克尔战后生活的一些情况：

许多医生、法官、公务员甚至艺术家都很快在战后重新找到工作，并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但与他们不同，汉斯·亨克尔的战后生活却是一团糟。因为他没有任何职业技能或其他特殊的才能，除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那套理论之外，他对实际生活一无所知。他把他的

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因此，纳粹德国的垮台，也就意味着他事业的结束。

在奥德特的来宾留言薄上，有些事件作了特别纪录，这其中包括男爵夫人的逝世。男爵夫人死于1947年9月19日，终年70岁。死后葬于奥伯海林根的教堂墓地。男爵夫人的讣告写在一张印刷卡片上，上面附有男爵夫人的一张照片。在讣告上，汉斯·埃伦斯还加上了一段手写的悼词：

你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在朋友和客人来参加的聚会上，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你的存在。我们似乎仍然听到你的声音，看到你充满智慧的眼睛。朋友们都非常怀念你，因为你总是和他们那样亲近。

你的孩子对你充满了爱戴和感激之情，你将永远活在他们的心中。

汉斯　奥德特　阿克塞尔

1947年11月

我猜想汉斯·埃伦斯之所以把这段话加在留言薄上，是想让来宾们了解男爵夫人与埃伦斯夫妇关系和谐，虽然有时候不是这样。

1947年11月8日至9日，汉斯·埃伦斯和奥德特在林中小屋举行了“47年文学社”的两次早期会议，“47年文学社”是一个松散的文学社团，成员包括当时德国的青年严肃作家。汉斯·沃勒·瑞切特是这个文学社的负责人之一，他在1985年写道：

文学社的入会资格很严格。那些积极参加和协助过第三帝国纳粹活动的作家都没有资格加入47年文学社。

在汉斯·沃勒·瑞切特死前不久，我与他有过一次谈话。他说林中小屋的会议内容他已记不起多少了，但他可以肯定汉斯·埃伦斯不是“47年文学社”的成员，而且他在德国文学史上也不是一个重要人物。

第二十一章

相聚布哈尔

今天我收到一封信，信是一位英国教授写的，他以前在波恩大学任教。在信中他试探性地问我是否愿意重新接受波恩大学哲学系荣誉博士的头衔。在战争期间，波恩大学迫于纳粹的压力，取消了我的这一头衔。我很高兴地表示愿意重新接受，这是我的一贯作风，对别人的要求我总是尽量满足。

托马斯·曼恩：《重获博士头衔》

1991年夏天，我和我的姐姐、弟弟以及他的妻子一起回到布哈尔，我们去看了布哈尔的犹太人墓地，我们的祖先内特家族和曼森巴赫家族都有人埋葬在这里。在市政厅里，我们和当地的历史学家赫尔·约克斯特进行了交谈。他对犹太社区的历史很有研究，并送给我两本著作。一本写的是布哈尔的犹太人历史，另一本写的是布哈尔的犹太人墓地。

1993年6月，我收到布哈尔高中迪欧尼斯·霍斯老师的来信。他告诉我布哈尔高中将举行25周年校庆，并将改名为卡尔·

内特学校。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纪念以卡尔·内特为代表的一批犹太人对布哈尔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我立即给迪欧尼斯·霍斯回了信，并向他提供了散居在英国、瑞士、美国的内特家族成员的地址。

不久之后我收到他的第二封信，信中通知我庆祝活动安排在9月9日—10日举行，届时将举行隆重的命名仪式。

7月我到凯尔的时候，我把校庆的事告诉了格德鲁恩，并问她是否愿意去参加这次活动。她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活动如期举行。10月11日，当地的报纸报道说，布哈尔市市长亲自主持了欢庆活动。他代表市政府欢迎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命名仪式的内特家族成员。在他的欢迎致辞中，市长称卡尔·内特是布哈尔最杰出的公民。

格德鲁恩后来对记者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内特的后代能够重聚一堂并互相认识。

11月我收到史蒂夫·纳尔逊的来信。他是我大学时代的朋友，他的母亲是卡尔·内特的女儿。在信中告诉我他很高兴与这么多亲戚相互认识，并附上一张他与格德鲁恩的合影。但奇怪的是信中没有提到格德鲁恩的近况。

后来格德鲁恩给我发了份传真：布伦希尔德患了癌症，就在命名仪式结束后，她被送进医院作了检查。检查结果发现癌细胞已经大面积地快速扩散，即使做手术也无济无事。

1993年12月3日，布伦希尔德死于癌症。

尾　声

1988年产10月我姐姐从华盛顿给我打电话，第一次向我透露家史。从那一刻起，我一直致力于探寻奥德特与希尔玛两人的经历。现在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记述两个人历史的书。但这本书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也许这本书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如果人们不知道，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奥德特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半犹太人”，但她却度过了幸福的一生。希尔玛知道自己是一个“半犹太人”，但却必须因此面对死亡。

但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成立。奥德特过着幸福的生活并不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半犹太人”身份，而希尔玛也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是一个“半犹太人”而被迫害致死。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希尔玛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半犹太人？如果苏黎士旅馆中真的发生过那件强奸案，而且作案人是个犹太人，那么希尔玛肯定是个半犹太人。但如果事情的真象不是这样的，那么希尔玛的半犹太人身份就不可能确立。

那么也许这本书印证了这样一句谚语：小心即大勇。奥德特安然无恙，逃脱了纳粹的迫害是因为她的母亲对她的“半犹太人”身

份守口如瓶。而希尔玛死于集中营则是因为他的养母向当局泄露他的“半犹太人”身份。但这种推测也同样站不住脚。因为没有人把希尔玛养母的揭发当真，希尔玛被宣布为“半犹太人”并最终被迫害致死，这与他养母告密并没有多大联系。

那么这本书是不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命运都是前生注定的。奥德特与希尔玛的差别仅仅在于一个人的命好，而另一个的命不好。但命运之说似乎也不能解释希尔玛的遭遇，因为他在1940年至1944年这段时间内，可以说是相当幸运的，并未受到纳粹的迫害。但后来他还是未能逃脱纳粹的魔爪。

这本书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也许只有读者自己最有发言权。但在写完本书之后，我有两点感触。第一，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简直是罄竹难书。第二，如果每个人都能像布伦希尔德那样正直、高尚并且充满爱心，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致谢词

我谨向布伦希尔德·内特及其女儿格德兰姆·梅雷勒·巴巴拉、奥德特·埃伦斯、米亚·冯·莫克勒、莫尼卡·埃伦斯致以真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慷慨帮助，我无法完成此书。

我同样感谢慕尼黑沃尔克·达姆博士的指导和柏林的美国文献中心的允许，使我能在书中使用埃伦斯与亨克尔的通信。汉堡的乔基姆·克斯滕博士和本书的编辑亚历克斯·舒尔茨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译后记

读者也许对二战期间纳粹分子如何迫害犹太人这一类题材并不陌生，奥斯卡获奖影片《辛德勒名单》不知使多少观众流下同情的眼泪。但读者也许不会对上述这段话有太深刻的感触，因为普通读者对那一段历史不可能了如指掌。埃里克·科克的这部纪实小说以它丰富翔实的史料和独具匠心的叙述，向人们展示了在纳粹执政前和执政期间德国人的生活和两个“半犹太人”在一个要求血统绝对纯正的年代里所面临的艰难困境，再一次证实了有时历史的真相可能比虚构的小说离人们更远。

《两个“半犹太人”的命运》是一部兼具传记与侦探小说特点的纪实小说。作品讲述的是希尔玛与奥德特两人的故事。希尔玛（作者继父妹妹的儿子）与奥德特（作者同父异母的姐姐）都是二战前生于德国的私生子，两人都有一半犹太人血统，而且都是在雅利安人家庭中长大。他们长大成人之时，正是纳粹党上台执政之日。于是作者开始追溯家族的历史。在本书中，希尔玛与奥德特的故事同步展开。养母发现希尔玛是个犹太人，尽管希尔玛是个孝顺的儿子，养母还是向盖世太保告发了他。希尔玛最终未能逃过劫难，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与此相反，奥德特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会有

犹太人血统。她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并与纳粹要人交往密切……作者通过这两个“半犹太人”截然不同的命运，深刻地揭示了纳粹分子对人性的摧残，读后催人泪下。

作者埃里克·科克1944年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担任过制片人和业务主管，著有《深深的吻》(1969)、《平静的暴乱》(1973)、《你最不想知道的事》(1976)等多部文学作品。

在翻译《两个“半犹太人”的命运》的过程中，译者为书中朴实无华的语言和引人入胜的情节深深打动。尤其是希尔玛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后给家人所写的那几封信，每一个字都是对纳粹分子疯狂的种族灭绝罪行的血泪控诉！正如作家约翰·罗伯特·科伦布所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本书都堪称一部杰作。它不仅仅是一部回忆录或家史，它更是一种对历史真相的探求”。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译完此书，期待着读者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体会到原作者的良苦用心。

本书译者的分工是：蒲黎负责撰写译后记，翻译1—11章；杜正国翻译第12—21章。

蒲黎

1998年6月3日写于重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两个“半犹太人”的命运
作者=（加拿大）埃里克·科克著　　蒲黎　　杜正国译
页数=113
SS号=11147978
出版日期=1998年08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